

全国优秀教师先进事迹

学
习
资
料
汇
编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2019年9月

目 录

一、李保国：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1
二、宋迪泉：教育扶贫二十载 用匠心践行初心.....	8
三、于瑾：燃尽芳华照初心.....	12
四、陈立群：爱与责任 无问西东.....	26
五、李琳娜：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者、实践者.....	34
六、黄大年：以身许国的地球物理学家.....	42
七、杨红军：一辈子扎根瓦山村小.....	62
八、于漪：坚守三尺讲台 胸怀江河世界.....	67
九、高铭暄：见证法治中国 尽心尽力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74
十、袁隆平：赤子之心 追梦稻田.....	78
十一、卫兴华：立学为民 治学报国.....	84
十二、王蒙：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	91
十三、段江华：光华绽于朴实.....	97

李保国：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李保国：太行山上新愚公

【习近平总书记评语：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 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35年如一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人物简介

李保国（1958年2月—2016年4月10日），河北省武邑县人，中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区治理专家，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常年高强度工作让李保国积劳成疾，今年4月10日凌晨，58岁的他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李保国去世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他的先进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先进事迹

“牛人”李保国

李保国很“牛”。他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太行山区农民眼中的“科技财神”，他的科研成果累计应用面积 1826 万亩，让 140 万亩荒山披绿，使山区增收 35.3 亿元，带动 10 万多农民脱贫致富。

点石成金的“科技财神”

“现在的葫芦峪，种啥都能活。”5月21日，站在石家庄市平山县葫芦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至高点上，面对绵延数公里的满眼绿色，葫芦峪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涛自信地说。

脚下，在一层层由荒山改造出来的梯田里，核桃、苹果、桃、薰衣草、玫瑰等，全都生机勃勃。

“目前已开发荒山 5 万亩，辐射周边 27 个村。”刘海涛介绍说，光园区里的水泥路就有 200 多公里。“这些路既是田间管理路，也是排水沟，雨水顺着路流到山下塘坝里，再通过管道由塘坝引入蓄水池中，最后滴灌到地里。只要全年降水 400 毫米，整个园区水就够用。”

10年前，刘海涛可没这份底气。“流转了几千亩荒山种核桃，投入了四五千万元，树苗种下去两三年，却都不见长。”直到2009年，请来了李保国。

“李保国一来，就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通，说这不行那不行。他越说不行，我越认定他行，因为他看问题很准。”就这样，李保国成为葫芦峪园区的技术总顾问，在这里建立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体系和“大园区、小业主”的新型管理模式。所涉村庄农民由人均不到1亩地增加到人均8至10亩不等，年收入由人均不到2000元增加到人均8000元以上。

刘海涛说，葫芦峪是李保国30多年开发太行山经验的“升级版”。在葫芦峪之前，李保国用他点石成金的科技之手，至少成就了三个“品牌”：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邢台县前南峪村。这里形成了国家4A级生态旅游景区，获得过“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五百佳”提名奖。但是，35年前，这里却是一个连草都长不好的荒山秃岭；

“太行山里首富村”——内丘县岗底村。村民今年人均收入3.1万元，种植的“富岗”苹果，荣获“2008年北京奥运会指定专用果品”和“中国驰名商标”称号，曾经创出100元一个苹果的神话。然而，20年前，这里却流传着“有女不嫁岗底郎，光着脊梁睡土炕”的歌谣；

“中华名果”——临城县“绿岭”牌薄皮核桃。如今，该县发展薄皮核桃种植 20 多万亩，涉及 138 个村 1 万多农户。龙头企业“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被扶持起来。可是，17 年前，创业之初的绿岭公司面对的却是一片“连鸟都不拉屎”的石头山。李保国曾说，山上仅能长树是不够的，还要栽下生金树，把财富带给山区百姓。他奔着这个目标努力，树果然生了金，百姓果然致了富。

攻坚克难的“太行愚公”

“无雨渴死牛，有雨满坡流。”太行山区土壤干旱，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自 1981 年起，李保国一头扎进太行山里，进行山区开发治理研究。

不能移山，却能易山。30 多年里，这位“太行新愚公”先后完成 28 项研究成果，推广 36 项实用技术，培育了 16 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

李保国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令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杨敏生深深敬佩。

杨敏生说，李保国大学时所学专业是蚕桑，可他后来却成为板栗、苹果、核桃、红树莓等果树的培育专家。“一个人能把一种果树研究透已属不易，他却先后研究了好几种，还搞一个成一个，并且个个形成了产业。”

在杨敏生看来，李保国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接地气”，始终坚持“生产为科研出题，科研为生产解难”的理念。

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胜福回忆说，他 1999 年邀请李保国做技术指导时，曾问过李保国：“你在岗底是做苹果研究的，也出名了，现在改到核桃上来，冒了很大风险，为啥？”李保国回答说：“老百姓不能只通过一种水果致富，如果不另辟一条致富路径，他们冒的风险比我大。”

李保国的团队里既有河北农大的教师，也有他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在生产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让一个学生负责一块儿，一点点地做起来，逐渐形成一个技术体系。”1996 年就加入李保国团队的河北农大教授齐国辉举例说，在李保国的指导下，一名学生经过四年实验，颠覆了核桃树冬季修剪的传统，将修剪时间确定在春季发芽前的 20 天以内，避免了因修剪时间不当造成营养流失的问题。目前，这一创新成果被写进了教科书。

把田间地头作为课堂，把农家果园作为实验室，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这是李保国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闯出来的成功道路。

助农致富的“农民教授”

今年 58 岁的岗底村农民梁山林，38 岁以前还是村民眼里的懒汉。“母亲端来早饭，他都是在被窝里吃，吃饱了还想再睡会儿。”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这样打趣他，梁山林不好意思地嘿嘿一乐。

其实 20 年前，即使勤快的岗底村民，也没能摘掉“穷帽子”。部分村民虽然已经种了 10 年苹果，当初致富的愿望却仍遥遥无期。特别是 1996 年 8 月的一场暴雨洪灾，更是让村民们感觉“日子没法过了！”

后来，村里来了省科技救灾组，其中一个人递给杨双牛一片写了字的烟盒纸：“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纸上还留了他的家庭电话号码。李保国对杨双牛说，“你 3 个月修一条通往村后沟的路，我再来。”

20 天后，路修好了，李保国真把行李铺盖卷搬来了，一住就是 17 年。如今的岗底，家家户户住上了小洋楼、开上了小轿车。706 口人的村庄里，有 191 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成为全国“持证下田”第一村。

梁山林观望了两三年，是村里最后一批种上果树的。现在他承包的 6 亩果园，每年收入 15 万元。40 岁的时候梁山林娶上了媳妇。女儿招了上门女婿，老梁给女婿买了一台北京现代小轿车，在家中顶梁柱的地位坚不可摧。

“李老师是我们岗底村的大恩人。”村民杨群小感叹，“如果没有李老师，我哪能轻轻松松地供完两个大学生。”如今，儿子、闺女都在县城机关里上班，老两口在家侍弄果树，一年收入八九万元，日子过得滋润。老杨笑言：“给个县委书记咱也不当，自由自在，收入也不低。”

说起李保国去世，杨群小哽咽了：“以后果树有病，找谁呢？”他说，李保国对脑子转得慢的村民跟得紧，培训时

会反复问他们“学会了没？”“记住了没？”杨群小还说，村民任何时候给李保国打电话，他都不会不理；即使完全不认识的农民打来咨询电话，李保国也会认真地解答。

李保国曾说，他一生最得意的是“把我变成了农民，把农民变成了‘我’”。李保国变成农民，赢得了农民的信任；把农民变成他，成为懂技术、能致富的农业专家。

让农民们改变自身命运，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乡亲们亲切地把他称为“农民教授”，李保国当之无愧。

宋迪泉：教育扶贫二十载 用匠心践行初心

巍巍天台山脚下，矗立着众多年代久远的川西小院，在其中一个院坝中，简陋的阳光遮雨棚下，40多张课桌摆放整齐有序，黑板、粉笔、乒乓球台……各类教学用具一应俱全。每个周末和寒暑假，附近山村近百余名留守儿童总会分批次聚集在这里，听宋爷爷讲课，学知识、学道理、学做人……

1955年，18岁的宋迪泉从邛崃师范毕业后，积极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当时邛崃最偏远的高何镇任教。42年时间，他坚守岗位，始终如一。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1997年，退休后的他坐不住了，走村串户，宣讲“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终因腿脚不便，实在走不动了，在供养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儿子情况下，用微薄的退休工资和种地收入，在家中办起“留守儿童家庭辅导站”，免费为孩子们进行义务辅导。他在平凡岗位上坚守教育的匠心，践行着他感恩社会、助力教育扶贫的初心。2012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

“一个都不能少”

耳顺之年，不忘初心

“教育，一个都不能少”。高何镇地处邛崃市西部山区，人多耕地少，经济条件较为落后。90年代以来，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谋生，不少留守儿童不愿学习，辍学现象愈发明显。

宋迪泉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唯一能够摆脱贫困、报效国家的机会便是读书。带着这种想法，他跑遍了镇上所有不愿上学的孩子家中，反复给家长和孩子们做工作、谈教育，走村串户了解邻近学龄儿童们的学习状况、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免费为孩子们讲解。他总是刚从这家讲完又匆匆赶到另一家，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是那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

一年，两年……就这样坚持了 11 年，改变了不少孩子的命运，高寅程同学就是其中之一。父亲高度近视和母亲聋哑，使高寅程早早辍学在家照顾父母，本以为会就此度过一生，但宋老师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高寅程的命运。2018 年，高寅程顺利考上同济大学博士。每年暑假回家都会专程看望宋老师，感谢宋老师帮助他树立了信心和精神物质上给予的支持。每每谈及，高寅程总是抑制不住眼中泛起的泪光。

“奉献是一种幸福”

古稀之年，执守信念

年岁的增加和多年走山路导致宋迪泉患上了坐骨神经痛，他佝偻的身躯已不能承受“一对一”的教学模式所需要的长途跋涉。每一次外出讲课，他都忍着巨大的疼痛，于是他下定决心，在自家院坝里办一个免费的留守儿童辅导站。

山区条件差，辅导站成立之初，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他用板砖做墩，木板做台，勉强自制了几张高低不一的“写字台”当作课桌；将自家门板下了，用石墩作支撑，做成乒乓球台供孩子们课间娱乐；找几张复写纸坚持用手写的“土办

法”为孩子们出习题。阴雨天气，他就把“写字台”全部挪到屋檐下，勉强遮蔽风雨。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便和老伴商量，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中午的伙食，还每月拿出自己退休和老伴微薄的种地收入，为孩子们添置铅笔、作业本、印刷试卷……承担起留守儿童辅导站的全部支出。

来辅导站上课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因缺少父母关爱和引导，他使用自己独特而成熟的教育理念在讲授文化课的同时，在心理健康和社会道德方面引导孩子们，教其做人的道理，并鼓励孩子们克服困难挫折，不断前进攀登，树立报效国家的志向。

宋迪泉前后共帮助近 300 名学生重回课堂。辅导站孩子最多时达 150 多人，先后有近 1000 多名孩子在这个简陋的“家庭学校”里学习、生活、成长、成才。帮助的孩子中，考上大学的有多人，其中上海复旦、同济大学 2 人，回乡执教 2 人，担任村主任、村支书 6 人，都成为邛崃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

“我要做一辈子”

耄耋之年，传承匠心

“这些孩子是祖国未来的希望，也是家庭脱贫奔小康的未来，助力教育扶贫事业发展，我要做一辈子。”他坚定地说。在破旧屋檐下，他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一直为之不辍。2012 年以来，宋迪泉入选“成都好人榜”，并被推荐为“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类候选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

出《凡人善举“宋老师的小院辅导班”》；中央电视台《身边的感动》栏目播出《宋老师的暑期班》。凤凰网、新浪、搜狐、中国文明网等媒体相继将宋迪泉的先进事迹广为传播。在宋迪泉精神的感召下，邛崃多名教师加入进来；成都诗词楹联学会著名书法家欧阳戈每个月都抽出两天时间来义务教孩子们写书法；每个暑假，来自北京、重庆、海南等多名大学生不约而同来到高何，担任辅导班的志愿老师。

用一生去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宋迪泉无私奉献、无悔付出，土阶茅茨遮盖不了，万仞天台阻隔不住，天台山下，高何这块曾经贫瘠的土地，如今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于瑾：燃尽芳华照初心

于瑾，199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系，随后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年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开设“投资学”“证券投资基金”等全新课程，在新兴市场微观金融领域成果丰硕，为推进学校现代金融前沿学科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她讲课深入浅出，对学生无微不至，深受学生爱戴。2018年5月24日，于瑾上午在学校完成工作回家，中午继续以微信方式指导本科生的学位论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年仅52岁。

于瑾已经离开一年多了。但她的同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江萍依然难以释怀。告别仪式、清明、周年祭……江萍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你走后，我才知道，想念一个人可以想念到绝望”。

时间回到一年前。2018年5月24日中午，签完最后一份博士生毕业材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金融学系教授于瑾收拾回家。

近两个月来，操心着学生们的论文，她疲惫不堪，头天晚上大概只睡了两个小时。看到“小同学们”一个个顺利通过，她太开心了，临走还笑咪咪地跟同事说：“那我就歇一阵儿了啊！”

说是歇一阵儿，回到家，于瑾又通过微信、电话回复了6名学生关于论文修改的问题。12:57回完最后一条学生的信息，她上床午休。

这是52岁的她走上杏坛的第28个年头。28年来，她从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成长为在学校广受爱戴的优秀教师。她喜欢这份工作，喜欢教师这一身份。28年来，她经受过诱惑，却始终没有忘记教书育人的初心，在三尺讲台上焕发出别样光彩。

按她一贯的日程表，待小憩醒来，她肯定还会继续伏案工作，或为学生答疑解惑，或完善手头的教案。

谁知，她竟就此长眠。

淡然一生

落幕却如此浓烈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但回想起来，也不算毫无征兆。

于瑾和爱人王文灵平时都运动，身体还可以。只有一条，她“责任心太重”，一遇到在意的事就睡不好。而学生的大事小事，她样样在意。

她的睡眠问题，贸大教务处处长蒋先玲也知道。她俩不仅是20多年的同事，也是密友。近些年，常听于瑾说，有时睡不好觉胸闷，看过医生倒也没发现什么毛病。

出事那天晚上8点多，当接到王文灵电话传来的噩耗，蒋先玲腿都软了，嘴里重复着：“别开玩笑，这种玩笑不能开啊！”

王文灵何尝不希望这是个玩笑。

最后，医院也没能找出明确的原因。再后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生朋友推断，她常年超负荷地工作，这次是从“极紧到极松”，身体机能没跟上，“耗尽了”。

2014级硕士生宋远洋那时候已经毕业到长春工作了。当他从微信里看到消息，“整个人懵了”。等回过神来，他立刻往北京赶，“要见老师最后一面”。

和他一样，于瑾的学生、老同学从大江南北甚至远渡重洋赶过来，为她送行。

学生们自发轮班，守灵三天三夜。2013级博士生史峰说，原本安排每班两人值守，实际最少都有七八个人一起，“就想守着，再多看老师一眼”。

宋远洋记得，八宝山公墓告别的那天，现场来了400多人，长长的送别队伍一直排到大门口。人们抱头痛哭，她的两个老同学伤心得当场晕厥。到后来安葬、清明，直至一年后的追思会，也是人潮涌动。

教书育人

她坚守初心做到极致

于瑾可能不属于“风云人物”。站了28年讲台，她没有行政职务，没有响亮头衔，就连送上门的荣誉，她都总是婉拒。

然而，在她走后的日子里，人群不愿散去，不愿忘记。每每聚首回忆她的点滴，称颂最多的是，她把两件本职工作做到了极致：一是课讲得好，二是对学生好。

于瑾的课，总是选课系统一开放就爆满，学生说，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把枯燥难懂的知识讲得有声有色。

比起那种天生幽默的“段子式”教师，于瑾总觉得自己讲课不够生动。为了把课讲好，她靠的是扎实的学识，下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苦功夫。

上世纪 90 年代末，国内微观金融教学刚刚起步。时任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林桂军找到于瑾，希望她尽快开设“投资学”这门课。这门课涉及大量数理知识，是她那个年代的教师没有学过的。

但于瑾干脆地接下了任务。她自学数理经济学，将深奥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实务紧密相联，运用大量的数据及案例来辅佐教学。

“学生疯狂抢课，每个课堂都是一再扩容。”教务处的同事早已习惯了。

后来，于瑾又开设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实务”等选修课。这些课程奠定了 21 世纪初学校金融学专业微观金融课程体系的基础。

再后来，学校引进了大量从事微观金融教学和研究的年轻教师。这时的于瑾欣然决定，把自己一手创建的王牌课程“投资学”及备课笔记主动送给新来的教师，自己又开始新

的挑战，去讲“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这门课更传统也更庞杂，没有全面而扎实的金融功底很难讲好，别的教师都不太愿意上。

结果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又被她打磨成一门金课。

宋远洋为于瑾当过好几年助教。他说，于老师的课案从不重复，每年都要彻底更新教材和课件，她还会特别考虑80后、90后学生的兴趣点，因此深受欢迎。

受欢迎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她几乎没有能按时下课的时候。

“我在教室门口等她下课，铃声响了，学生竟然不是涌出教室，而是涌上讲台，把于老师层层包围起来。”这是史峰第一次和于瑾约见的场景。

的确，每一次，于瑾在上完两个半小时的大课后，都会留下来为学生答疑一两个小时，晚上7点能走就算不错。不管到几点，她都不会主动喊停。

这已经是惯例了，多少次先生、儿子到教学楼下接她，只能干等。

家人没说过二话，但蒋先玲“看不下去”了。她知道，于瑾讲课很投入，秋冬天也常常讲出一身汗；每次一站两个多小时，累了也不肯坐下，“学生都站着呢”。她还知道，于瑾错过饭点儿胃会难受。

担心于瑾累坏身体，蒋先玲也养成一个习惯，每逢于瑾有课，自己值完班了，就去教室看一眼——她果然还被学生围在中间。

蒋先玲提高嗓门就开始“轰赶”：“走了走了同学们，有问题等答疑时间去于老师办公室啊！”

蒋先玲不记得自己扮了多少回“黑脸”，也不知道劝了她多少次，但于瑾总是笑着说：“这样学生比较方便嘛。”

这些年，金融行业的机会很多、薪酬很高，但于瑾没想过离开讲台。28年，她为近1.8万名学生开过课，指导培养了94名硕士生和7名博士生。

或许，这就是她最引以为傲的数字。

仁爱之心

她呵护着身边每个人

于瑾课讲得好，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她对学生有多好，却是在她离去后，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逐渐拼凑出来的。

因为她自己，从来不提。

回忆于瑾的点滴，学生们说，她有一颗仁爱之心，总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总是能发现每个人身上的优点。和她相处，如沐春风，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到了启迪、获得了成长。

课业里——

她总是写长长的邮件指导开题、回复提问，学生简单一问，她往往会回复好几千字，还附上案例“供参考”。有时回复晚了些，她都会郑重道歉。

她对论文指导极为细致，而且特别注重保护学生的独立思考。宋远洋自认思维比较“另类”，在他的毕业论文面临重大修改、可能难以顺利通过的日子里，于瑾联系多位业界行家帮忙看论文提意见，反复和他沟通每个细节，还不忘给他做心理建设：“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没关系的。”

生活中——

她可以清楚地记得学生第一次见面时的穿着，准确地说出每个弟子的家乡、小名和爱好；她会默默关注学生们的社交动态，叮嘱出去旅行的学生不要在夜里爬山。

她给予帮助的时候，总能找到让人欣然接受的方式。1997级本科生夏威在准备留学时遇到经济困难，于瑾提出，用人品信用众筹，“用你未来工资现金流抵押”，并率先拿出1万元，最后为夏威筹集35万元。为了打消夏威的心理负担，她说：“能为自己的项目融资才是真正学金融的人。”

人生路上——

她很少说教，却把家国情怀种在了学生心里。2010级硕士生范蔚然毕业后在建设银行工作，2015年，他放弃年薪百万的出境发展机会，报名选派陕西安康驻村“第一书记”。当时，身边人都觉得他“傻”，但他知道，于老师一定懂他。

果然，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于瑾时，于瑾非常支持，还多方联系朋友支持村里的扶贫项目。范蔚然踏踏实实驻村两年，与当地村民、学校结下深厚情谊，驻村期满后主动延长了近一年才回到原单位，如今依然进行着全行系统的定点扶贫工作。

范蔚然说：“于老师没有要求学生做什么，但在她的耳濡目染下，我就觉得，人不应该只为赚钱，只要有机会为国家、为贫困地区做一点事，人生就是最有意义、最光荣的。”

另一名她早期带的硕士生何亮宇，本科毕业时有一个去甘肃农村支教的机会，他想去，又担心未来。于瑾知道以后非常鼓励，直接许下诺言：“等你支教回来，只要你愿意，我当你导师。”2002年，何亮宇支教一年回来，如愿成为她的学生，如今在负责一家大型基金。

这样的故事哪里说得完呢？于瑾不仅关心着每个学生，身边的同事们也是她呵护的对象。为了年轻教师能有安静的环境做研究，于瑾把自己作为教授的独立办公室让出来，自己在教室、会议室“打游击”；甚至在她走后，家人还从她的包中发现准备捐给学院患病教师的3000元爱心款……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突然离去，这些故事可能还是施受者之间的独家记忆。人们感叹于她的仁爱之心，又会在听到新的故事时频频点头：“没错，她就是这样的人。”

学术追求

在专业前沿奋勇开拓

说起来，于瑾所在的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还是她的大学师弟。于瑾 1984 年考进南开大学金融系本科，比洪俊杰早六届。

按说两人当时没什么交集，但洪俊杰早早听说，南开有两个人谈恋爱特别浪漫。为了追求女生，男生主办了一场名为“爱之春”的钢琴爵士音乐会，还在主持开场白的时候暗藏告白；男生利用公共澡堂的天然混响，自弹自唱录了几十首歌的磁带送给女生……

这两个人就是于瑾和她的爱人王文灵。

学生时代，于瑾漂亮又拔尖，追求者甚众。他俩在一起，有些同学还颇为不解。这时于瑾会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反驳：“你不觉得他志存高远吗？”

30 年过去，如今老同学们懂了，他们有相通的家国情怀，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那时候，于瑾读金融、王文灵读经济，20 岁出头的小情侣散步聊天，说的都是专业上的事——“金融资产定价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搞懂我们国家的新兴市场，才能进行监管架构，否则无法让社会资金转变为长期资本”……

于瑾关注的往往是金融领域比较前沿、艰深的课题，比如利率、期权、金融衍生品等。洪俊杰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金融学科起步不久的背景下，这些偏微观的课题比较冷门，研究起来有风险，而且对数学要求极高。

但这都不在于瑾的考虑范围内，她认定这些研究对国家金融学科建设意义重大，王文灵也很支持，两人就埋头钻研起来。

1991年，从南开大学金融系本、硕毕业的于瑾来到贸大任教。1996年，30岁的她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开展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她注意到金融衍生品在微观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实务领域的巨大影响，更加深入地开展了对互换、期货、期权问题的研究，并在1998年发表了衍生品定价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成为国内研究金融衍生品定价领域的第一批学者。同时，于瑾一边教书、一边求学，在贸大攻读博士，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进入21世纪后，国外定量研究和微观金融研究开始进入我国学界视野。对新知识的渴求使她决定改变研究方向，致力于微观金融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利率期限结构研究》。在论文中，她系统地综述了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最新成果，在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中理出清晰的脉络，准确地抓住利率水平的期限结构、利率波动率的期限结构和不同到期日的远期利率之间相关性的期限结构这三大主题，紧紧围绕现代金融理论均衡定价法和无套利定价方法等基本方法，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模型建立、参数拟合与实证检验等方面作出全面剖析。

她娴熟地运用众多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利率衍生品定价和资产管理的实务之中，推进了国内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前沿发展。

在治学方法上，于瑾既关注国外学术前沿成果，也强调尊重我国国情，尊重历史的选择，尊重我国金融市场特有规律，提炼符合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特质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她又将研究重点从西方微观金融，逐渐转到新兴市场微观金融这一新领域，并以《新兴市场金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题申请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课题。

她对新兴市场十几个代表类型国家金融体系的演变与经验教训进行了持续 10 年之久的比较研究，总结提炼出金融发展国家战略、职能分工、监督体制、法律制度、内外资投资者结构及资本市场运行效果等相关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为我国金融改革提供了更多理论依据与对策选择。

于瑾著书不多，但获评颇高。被誉为“期权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十分欣赏于瑾的才华，把她的研究成果收录为麻省理工学院教学材料，在得知她离世的消息后，十分难过。他说：“于教授在新兴市场金融领域的研究引人注目。”

做了一辈子“高大上”的金融研究，于瑾其实还有个小愿望。她常常跟王文灵说，退休以后要一起去农村当老师，还调侃他的普通话不标准，“你就教数学好了，语文跟英语还是我来吧”，说完一笑。

不管在城市还是去农村，当老师，是她一生不会改变的选择。

王文灵始终记得初见于瑾的模样：眉目清秀，皮肤很白，头发卷卷的还偏一点黄，安安静静的，“像一朵花在那里”。

这个自认为顶天立地、什么都扛得住的男子汉，却在爱人离去后的几个月里，一头乌发全部变白、掉光，判若两人。

离退休还有 8 年呢，于瑾就这么走了。

回响

“最好的思念就是活成你的样子”

在离世前的两个月，于瑾刚刚忙完研究生新生入学面试，就马上投入到紧张的毕业论文答辩工作中，她无数次地与学生讨论论文，反复修改，夜以继日，耗尽心血。直到离世前，她还负责指导 14 名硕士生、4 名博士生的学业。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洪俊杰叹道。

于瑾突然离世，让学校师生和昔日同窗都悲恸不已。他们自发捐款，分别在南开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筹建“于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师德高尚、默默奉献、深受学生爱戴的一线教师，奖励志存高远、刻苦学习、成绩优秀的在校学生，支持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师生。学生和昔日同窗自发建

立了名为“于无声润物，瑾芳华筑才”的微信公众平台悼念、缅怀她。

“她就像人间四月天，美丽又温暖。”熟悉她的朋友无不这样赞叹。“她就像温和的河流，不知不觉间，把一个个特别有棱角的硬石子温柔地变成光滑美丽的鹅卵石。”

“对你最好的思念，就是活成你的样子，把你的爱传递下去。这样，你就仿佛从来没有远离。”江萍在其去世一周年的追忆会上深情地说。

于瑾去世后，贸大追授她“模范教师”荣誉称号，校党委书记蒋庆哲说：“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在平凡岗位上铸就不平凡的职业理想，她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看得见、学得来、做得到的典型。”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在看到于瑾事迹材料后评价，于瑾老师是“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立德树人使命”的英雄和楷模，真正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四有”好老师标准，是全国教师共同的光荣。他还说，金融行业总讲“杠杆”，于瑾这样的教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影响了那么多人，她的育人“杠杆”作用是最大的。

瑾为美玉，质本无暇，方诚信而达博学；美亦有则，唯求索乃得笃行。

回想和于谨相处的这 20 年，蒋先玲就一个感觉：“她是天生的好老师，她不孤独的，不管上课、下课，即使到了生命尽头，她永远被学生围在中间。”

陈立群：爱与责任 无问西东

头顶“全国名校长”的光环从任上退休，婉拒百万年薪聘请，却离开繁华都市和亲人远赴黔东南偏远山区无偿支教，成为当地唯一一所民族高中校长，躬身教育扶贫，重视“精神成长”，不改初心本色……他用“师者”的爱心和责任，为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注入时代精神，为边疆地区孩子点燃梦想与希望。

——题记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有一位“杭州来的”校长，赢得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广泛赞誉。他，就是63岁的支教老校长陈立群。

陈立群原为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校长。担任校长30余年，他把教育工作者的爱心与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不忘初心、矢志不渝，从教履历闪亮着一串串耀眼的荣誉：浙江省内首创宏志班，国内首创精神教育，出版专著10余本，《宏志精神迁移的实践研究》获浙江省新世纪十年基础教育重大课题评比一等奖，《宏志精神引领下学生精神成长的行动研究》被列为教育部重点课题，带领多所学校从平凡走向卓越，是位响当当的“全国名校长”。花甲退休之年，他重整行装再出发，远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义务支教，并于2016年8月开始担任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短时间内使学校和当地整个教育工作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坚守“爱与责任”的师者情怀

“人类道德的基点是爱心与责任感”，这是陈立群常对师生们说的一句话。作为教育工作者，他认为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和要求，要把这句话刻在内心、形成习惯。

自从投身教育事业，陈立群走得很坚定，干得很出色。从浙江桐庐毕浦中学，到窄溪中学……杭州长河高中、学军中学，从教43年，历9所学校，担任校长32年，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生源，不同的起点，他的管理均能从量变到质变，化腐朽为神奇，把原本普通后进的学校带到当地拔尖的水平。2001年，他在浙江首开“宏志班”，以“回原籍高考”的大胆创举践行教育公平理念，更以“宏志精神”的兴起、发展和迁移的实践研究，首先举起“精神教育”大旗。

2016年3月，年届60的陈立群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开展义务支教，当看到民族地区较之内地落后的教育现状，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夜不能寐，于同年8月应邀担任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而与此同时，杭州多家民办学校纷纷向这位即将退休的“名校校长”投来“橄榄枝”，并许以百万以上年薪，都被他婉言谢绝。

台江是中央组织部和杭州市对口帮扶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山区县，台江民族中学3000多名学生中，属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达1200多人。刚到台江民族中学上任，走进学校食堂，陈立群直接被“吓”到：刚端出来的菜盆边上，密密麻麻停满了苍蝇。诺大一所学校，只有一个食堂一口锅。

一到用餐时间，师生们排着长队，半天打不上饭。学生宿舍也十分糟糕，几十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除了床，几乎没有什么配套用具，卫生间气味扑鼻……

他首先下大力气解决师生吃住问题。学生食堂，从一个增加到三个，消除了打饭排长队现象。另单独开设教工食堂，通过伙食补贴降低教师餐饮开支，提高伙食质量，严格卫生管理，教师们从过去大都回家吃饭，变为一日三餐在校吃饭，这样和学生交流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到校两个多月时间，学生搬进了六到八人、带独立卫生间的宿舍。全校实现寄宿制管理，承担起社会责任。

硬件设施改变的同时，学校教学水平突飞猛进：此前，全县中考前 100 名学生，留在本地读高中的只有十来个人。而近两年，台江民中招生录取分数线提高了近两百分。考上本科的学生，按照进出口增量计算，已经从全州垫底冲到了全州第一。辍学的学生从以往的每年 100 多个，到近两年的净流入。当地老百姓用自己的选择，表达对陈立群校长的支持和信心：2017 年，台江县中考前 100 名学生，留在本地读书的有 95 人；2018 年，全县中考状元也第一次留在了台江民族中学。

关注“精神成长”为师生立“志”

陈立群常引用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教育首先是精神成长，其次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

无论对学生还是老师、家长，他格外重视“心灵唤醒”“精神教育”的力量。

走近台江民中的教学楼，两幅巨大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文字是陈立群亲自撰写的。上联：一生诚做基，不装不作不混，励志笃行出大山；下联：万代勤为本，用力用脑用心，真才实学报家国。

初到台江民中，听课时，偶尔发现一个高二教室的愿景墙上贴着一位男生三年高中的愿景是“娶一个老婆回家”，陈立群当即找到班主任，带着责问的口气说：“你怎么可以把学生闹着玩的东西放在相对严肃的愿景墙上。”班主任带着委屈说：“这就是这个学生的真实愿景啊！”将信将疑的陈立群找到这位学生，学生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我的父母交代我说，寨子里有很多光棍，你书读得好一点差一点都没关系，但一定要娶一个老婆回来。”

自从陈立群做了台江民中的校长，师生们就多了一个节日：“12.9 励志节”。每年这一天，高三年级的师生以班为单位，都要在校园里种一棵“志向树”。树的下面，还埋有一个瓶子，里面是全班师生的高考志向和人生理想。从台江民中的大门往里走不多远，就能看到全校师生植下的“志向林”，虽然还是幼苗，但已是葱茏一片。

树是苗族的图腾。苗族同胞有“生死一棵树”的习俗：出生时种一棵树，离世时把这棵树砍下，作为自己的棺木。陈立群为苗族人和树木的生命关系，充实了“志”的新内涵。

陈立群通过班会，成人仪式，升旗演讲，朗诵比赛，游学，社团活动，读书活动等等，强化激发师生们对“志”的理解和思考，希望苗族师生都能培养起“高远的志向、高昂的志气、高雅的志趣”，成为引领、陪伴一生的精神武装。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如何在欠发达地区恢复和创设尊师重教、耕读传家的良好民风？陈立群号召老师们走进寨子，把社会最底层撬动起来，让百姓们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意义。在中组部帮扶台江工作组的协调下，陈立群亲自培训驻村第一书记，内容包括教育与脱贫、尊师重教、家庭教育等等。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高考后，陈立群将教师分成几个组，走进寨子给高考中榜家庭送喜报，大力宣传“考出一个孩子、脱贫一个家庭、带动一个寨子”的典型事迹，启发村民重视教育。

校长是孩子们的“大家长”

作为一校之长，陈立群更像一个大家长时时为孩子们操心。台江民中的学生家长，有一半以上在外打工，很多学生缺乏完整的家庭关爱，父母常年不在身边，还有的因为重男轻女陋俗从小被遗弃，或者父母离异。陈立群非常关心关注困难、留守家庭学生的身心健康，不遗余力确保让每一个孩子安心学习、健康成长。到贵州工作之后，他出钱资助了多个贫困学生。

只要听说有师生生病住院，他再忙也要挤出时间亲自去探望。多次晚自习时间亲自送学生到医院并陪伴着学生挂点

滴。一天晚上十点多，陈立群去医院第二次看望高烧住院的学生田美。这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妈妈远在广州打工。尽管病得较重，田美执意要求第二天回校读书。陈立群说：“生命重要，还是学业重要？”田美回答：“一样重要。”陈立群俯下身子，亲切地对田美说：“傻孩子，学业落下了，还可以补，而生命只有一次。”田美含泪表示：“我不想自己将来还是过妈妈现在过的日子。”多么朴实又迫切的愿望！简短的交流让陈立群揪心不已。离开医院，他就对田美回校后的补课做了周密安排。当田美安心治疗后出院，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很快就把耽搁的课程补了回来。

高一（3）班学生毛进行是2018级高一报到最晚的学生。暑期，他搭乘叔叔的摩托车从老家赶往县城，不幸遭遇车祸，腿被甩骨折住进医院。陈立群听说后，想方设法帮助毛进行筹集手术费用，保证他及时得到有效医治。出院时，陈立群还自己出钱特地安排校办老师去凯里买了轮椅送到医院，把毛进行接到学校。那段日子里，虽然还不能正常行走，但毛进行每天坐着轮椅学习，课程一点都没有耽误。

陈立群特别关心家庭贫困学生，为了及时摸清学生的家庭情况，每逢周末休息时间，陈立群都会走村串寨，对学校困难家庭的学生进行家访，鼓励家长让学生完成学业。如今，陈立群的家访足迹已遍布全县各乡镇的许多苗寨，看到处在暂时困难中的贫困家庭，他总是忍不住出钱帮扶，累计已达10多万元。陈立群说：“我就是一介书生，我一辈子只做一

件事，就是教好书，做好我自己的教育工作，不为功利，不求功德，只为心愿，这个心愿就是有更多的苗族孩子，能够走出大山，去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民众整体文化素质水平的提升，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那么大，教育欠发达地区那么多，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这些事。”

培养一支“不走的”教师队伍

中组部陈希部长亲切接见陈立群，充分肯定他在扶贫工作中的贡献。陈立群在向陈部长的汇报中提到：“所有的帮扶总是暂时的，所有的支教总是要结束的，关键在于增强贫困地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在支教结束前，陈立群希望培养当地的造血功能。除了管好一所学校，他开始培训全县、全州乃至省内的校长和教师。

陈立群曾两度被聘为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应邀为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的全国优秀校长研修班授课 30 余次。来到黔东南以后，已多次应邀为黔东南州贺代明、汪海清名校长工作室的校长们义务授课。并被聘为“黔东南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首席专家”和“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专家贵州省工作站专家”。贵州省教育厅专门成立了“贵州省陈立群名校长领航工作室”，30 名学员来自贵州全省各个地区。

如今，陈立群义务作报告开讲座的足迹已遍布黔东南州的所有 16 个县市以及州外的其他一些县市，累计义务作报

告开讲座 60 余场，接受培训的校长教师已超过一万人次。在听了陈校长的报告后，当地的校长教师们都说：“陈校长的报告是至今为止所听到的最好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非常接地气，收获很大。”

台江县教科局为了充分发挥陈立群的名校长引领辐射作用，把全县的 18 位初中小学校长分成六批到台江民中学习取经。陈立群始终做到热情相待，对校长们提出的问题给予一一解读。2019 年 2 月，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省教育工委、贵州省教育厅联合下文，要求全省各县市区学习推广台江县教育“组团式”帮扶的经验。

淡薄名利、立德树人。从 2009 年开始，陈立群与爱人商量决定，把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杭州市杰出人才奖的 20 多万元钱拿出来，并动用整个家族的力量，设立“奖教金”，这个奖教金从杭州长河高级中学到杭州学军中学，再到“台江县民族中学陈立群奖教金”。目前该奖金已在台江民族中学先后发放了三次。陈立群还表示要想方设法，让这个奖教项目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陈立群义务支教的义举，在浙江、贵州，乃至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已经有更多的杭州退休和在职教师跟随陈校长的脚步来到黔东南支教，仅台江民族中学就有 18 位这样的教师。

李琳娜：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者、实践者

她潜心职业教育教学，愿奉献一生，甘为人梯，争创佳绩。她把教育工作升华，服务社会、带动一方，诠释教育的真谛与价值。她在教书育人事业中矢志不渝发挥着作为教师、专业带头人和业内领军人的作用，更实现着教育报国的崇高追求。

——题记

李琳娜，执教 30 载，她以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之心，坚守讲台，尽职尽责，用爱心与知识为国家培养了近千名各类人才。她先后被授予国家级“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全国黄炎培杰出教师等荣誉称号。她的教学成果和先进事迹被《中国教育报》、凤凰网等媒体报道传播，在全国引起一定反响。回顾李琳娜走过的 30 年教育生涯，我们不难发现名师光环下的艰辛付出、掌声鲜花后的不懈追求——

执著职业教育 专注育人大业

人们常说，人民教师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李琳娜从教 30 年，视讲台如生命。她热爱教师这份职业，珍惜这个青春闪烁、活力四射、朝气蓬勃的舞台。星移斗转，如今，她已到人生耳顺之年，但对讲台的热爱始终如一。

多年来，在李琳娜的日程表中没有节假日，没有下班时间，她将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每天白

天上课，带学生实训，到企业服务，培训教师团队，处理各种管理事务，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只有当夜深人静时才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与整理文案，潜心科研教研……李琳娜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通宵达旦、甚至连续工作 40 多小时是常有的事，所以同事们送给她一个绰号——“永动机”。

这台“永动机”也在不断推动着他人。她先后带领 200 多人次参加全国各类职业技能大赛，其中有 30 多人次获得不同奖项，包括国家一级大赛银奖 4 人次，省级大赛一等奖 10 多人次；带领 100 多人次参加其他全国性大学生竞赛，20 多人次获奖。

创新创业创富 培养培育新人

回顾李琳娜这些年的教学历程，处处写着“创新”二字：2004 年的“岗位能力导向”电子商务十大岗位课程开发实践；2005 年商科类“六位一体”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2006 年基于 SOHO 服务的“网上创业模式”；2007 年基于“SaaS 服务模式”的生产性实训；2007 年创新完成高职经贸人才的“ π 型人才培养模型”研究；2008 年开发经管类理实一体教学平台，破解了经管类实践环节瓶颈问题；2009 年校企合作，构建现代服务业综合训练平台，开创了经管类跨专业训练的先河；2010 年创新提出“现代虚拟商业社会”构想，创造性地解决了经管类专业“活”案例问题，动态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011 年打造基于上述思想设计的综合实训平台，与之配套的“看、学、做、用、觉、悟”六度

学习模式培养了第一批试点学生，成果显著。目前，这些教学成果已经被几十所院校采用，并于 2014 年、2018 年连续二届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现担任海南三亚北鹅旅业有限公司、人和力拓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总经理的吴高义，是学校 2003 级电子商务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把李琳娜老师视为自己的“思想启蒙者”。李老师当年课堂上的一句“以网络为平台，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率的事”成为多年来他运作企业的秘诀。

由李琳娜率领的经管学院学生的就业率多年来一直高居全国高职经管类榜首。目前许多学生已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据不完全统计，有上百万资产的创业学生有 20 多位，企业或行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已有 80 多位。

校企社会携手 实现教育质量升级

众所周知，海南曾是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电子商务专业教育没有平台、没有产业环境支撑“无商可为”，李琳娜作为电商专业带头人十分着急。为拓展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渠道，助推海南新经济发展，2004 年开始李琳娜教授带领团队策划实施了“助推海南电子商务发展”系列公益活动，坚持 14 年不放弃。

她将公益活动与教学活动、企业服务结合起来，形成“校企社”三方联动、共享、共建、共赢的柔性化合作机制。目前已完成五个系列活动：第一个项目是免费为海南中小企业构建网上商务平台（2004 年-2006 年）。第二个项目是为

中小企业开展网上业务助力（2007年-2008年）。第三个项目是“三个一工程”，即为中小企业“建一个站、培养一名网管员、指定一名网络营销顾问（学生）”（2009年-2010年）。活动的直接受益者是中小企业，第二受益人是学生。学生在直接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学习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为今后就业或创业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活动还扩大了学院的社会效益，让企业、社会重新认识高职教育，实现学校、企业和社会三方共赢，为海南经济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型人才。第四个项目是“百家企业商务电子化”工程（2011年-2013年）。第五个项目“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咨询服务工程”为海南中小型反季节瓜蔬冷库提供技术服务，带领学生在农产品保鲜与储运、鲜活农产品交易、信息化管理等方面提供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工程（2014年至今）已是系列公益活动的第六个项目了。海南有五指山、临高、白沙等国家级贫困县，李教授带领团队尝试让电商师生离开平台、离开讲台，带领他们走进农村与贫困户结对子，“四位一体”（农户、村小二、村官、大学生）帮助贫困户家庭畜植产品进城。

“助推海南电子商务发展”系列公益活动实施14年多，为中小企业创造直接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先后为300多名学生解决顶岗实习问题，创造就业岗位近百个，为海南中小企业腾飞助力。

科研助力经济 服务产业发展

“我们非常欢迎李教授的团队来我公司调研，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为公司做大做强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海南永青集团副总龚农在一次校企合作对接会上如是说。

李琳娜教授作为省委省政府直接联系专家、海南冷链物流研究所所长，多年来不断探索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服务的最佳模式，身体力行高职教育“服务为宗旨”的理念，充分发挥高校教师的科研能力，调动高职院校上万名高素质职业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做贡献。

构建热带现代农业基地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六项战略任务之一，这是国家赋予海南的重要使命。根据 2010 年印发的《关于海南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海南省商务厅成立“海南冷链物流研究所”，面向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围绕冷藏技术、农产品保鲜与储运、鲜活农产品交易、信息化管理和电子商务平台等实际经营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研究解决技术“瓶颈”之策。李琳娜作为海南省级特色冷链物流专业带头人，多年为鲜活农产品企业解决许多运营中的问题，在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被聘为首任“海南冷链物流研究所”所长。任职以来她先后为海南省商务厅、农业厅重大政策决策做出了十几项支持性研究。包括主持完成《海南鲜活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专项调查》《海南冷链物流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海南省 2007-2012 年农业投入与产出绩效分析》《海南省冷库补贴政策优化研究》

《海南省热带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研究》；起草《海南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十二五规划》；参与论证《海南省物流十二五发展规划》；校企合作编写《海南果蔬商品化标准》《冷链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实训操作规程》等。

李琳娜教授带领学生为推动海南省鲜活农产品直供直销配送体系链条上的企业信息化，开发多家企业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电子商务平台，为多家热带产品企业代运营电子商务业务，实现学生“创新、创业、创富”教育和实践的良性循环。

牵头电商联盟 助力精准扶贫

“助推海南电子商务发展”系列公益活动开展 14 年来，免费为中小企业建电子商务平台，免费协助中小企业进行网上营销，免费为下岗人员进行网上创业培训服务并帮助他们参加“聚农公益计划”，将学生创业能力培养与电商精准扶贫相融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系列公益活动直接帮助“三农”销售农产品总额 100 多万；为 50 多家合作社、100 多户农民、20 多家农业公司提供服务，每个月的经营效益达 20 万元，将“公益+教学+创业”有机结合。

为解决外部产业条件不足、电商人才培养实战环境缺失的问题，李琳娜经过大量调研分析与实践探索，通过整合需求、整合资源，形成了企业、学校、社会等多方参与职业教育的“ESSI 合作育人模式”，创建了可供省内外企业发布真实工作任务的“实践工厂”。这一模式构建和平台搭建使得

大量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任务源源不断呈现，成为实践教学的项目内容，创设了“企业出题、教师析题、学生答题、企业评题”的实战环境，为满足电商人才重在实战培养的要求创造了条件。在企业任务发布者指点评价和学校教师指导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提高，在真实任务“做中学”中获得了实践能力提升。同时，教师实践教学水平得到提高，学校实践教学案例更加丰富。2014年，“基于 ESSI 合作育人模式的电子商务双能力培养体系及其实践教学平台应用”获得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4年以来，本成果以海南农村电商发展为新课题，抓住外部发展机遇再次升级。在海南县域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商务厅支持下，牵头组建了“海南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创新联盟”，并获得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授牌“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案例教学研究中心”“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和“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服务基地（乐东基地）”，进一步整合政府、企业、学校、乡村、专家、农户等资源，将人才培养嵌入产业发展中予以通盘考虑，以产教融合深化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改革。通过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开发农村电商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改进教学方法和评价制度，校企互聘共培师资等，创新了基于“ESSI 合作育人模式”的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体系，服务农村

电商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效益显著提高，发挥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应，做到了人才培养“源于产业需求、服务产业需求”，为产业欠发达地区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创建了一个可借鉴的模式。

黄大年：以身许国的地球物理学家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激流匆匆。唯一不变的是，总有殷殷志士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拳拳赤子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中国长春，吉林大学地质宫，门前一对石狮左右雄踞，见证了超越一个甲子的沧海桑田。

66年前，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合并到吉林大学的长春地质学院的前身）在此诞生，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离开英伦回到祖国，担任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

7年前，大雪纷飞的平安夜，一位国际知名学者“作别西天的云彩”，从英国剑桥飞回祖国怀抱。他悄然踏进吉林大学地质宫，脚步声却震惊了整个世界。有外国媒体报道称：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他就是黄大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当今中国不可多得战略科学家。

心有大我，让他的行止有了山的巍峨；至诚报国，让他的胸怀有了海的辽阔。他以战略科学家的气魄，为国家地球深部探测技术运筹帷幄；他以教育家的身姿，为培养学生尽心尽责；他似一朵浪花撞击着梦想的礁石，又像炽热的熔岩冲出地壳，奔涌燃烧，光芒四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永远地走了，带着他对祖国最深沉的眷恋，带着祖国对他最不舍的呼唤……

一粒中国梦的种子发了芽

大雪无痕，英雄有迹可循。

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从哪里来？

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有其宏大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心路历程。

刚刚大学毕业的黄大年，在毕业留念册上，就写下了这样的豪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从他的一份工作自述中，也能清晰地管窥他高尚的内心世界。

这是怎样一位纯粹的、有情怀的、赤胆忠心的科学家！

黄大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父母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父亲对黄大年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在一些小事中锻炼他的记忆能力和应变能力。“中国的未来绝不能没有文化知识。”记忆中，父亲经常讲到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他们“沉稳”“和善”，“带回国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1966年，“文革”爆发，8岁的黄大年正上小学三年级。受这场浩劫的波及，他随父母下放到桂东南一个遥远的小山村。初中时黄大年离开家，到罗城县的“五七”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工农兵学校，虽然教学环境封闭，但学习生活井井有

条。黄大年从这里学到了自律、独立，每当他听下放的知识分子讲课，眼睛里便满是崇拜的“星星”。

艰苦的生活，磨砺着他幼小的心灵；漂泊的日子，让他在适应各种环境中倔强成长。高中时，他又跟随父母辗转广西贵县，考入贵港中学。高中毕业时，当地的地质队要招两名航空物探操作员。由于反应机敏，成绩优秀，17岁的黄大年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

作为航空物探操作员，他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广袤土地、秀美山川，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对祖国河山质朴的爱，深深植入他的心田。

从此，黄大年的“地质梦”拉开了序幕。

1977年恢复高考，关闭十年的考场重新敞开大门。全国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寒冬，黄大年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他欣喜若狂地拿起书本，踏上高考征程。

高考前一天，黄大年走了近一天的山路，到达广西容县杨梅公社高中考点，跟随浩浩荡荡的赶考大军进考场。有志者，事竟成。黄大年如愿以偿，以杨梅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是当时大学校园最流行的口号。在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宫，黄大年真正走进了地球物理学的殿堂，他几乎天天泡在地质宫二楼的阅览室，厚厚的一本弗

拉基米诺夫数学物理方程习题集，做了一遍又一遍。聪明加刻苦，他连续获得“三好学生”和标兵表现奖。

课堂上认真聆听，图书馆聚精会神；舞台上一展歌喉，足球场挥汗如雨。黄大年不仅学习好，还多才多艺，大家都喜欢这位阳光帅气、聪敏机慧、热情奔放的青年。

美好的大学时光倏忽而过，转眼来到毕业季。当时流行写毕业留念册，在册子上留下青春的照片和临别的赠言。

那是一张一寸黑白证件照，24岁的黄大年，一头浓密黑发，目光坚毅，俊朗的脸庞充满朝气。照片上方，有一句赠言简短有力：“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一颗中国梦的种子，此时发了芽。

1982年，黄大年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又考取硕士，硕士毕业，继续留校任教。他曾获得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从助教到讲师，风华正茂的他一路优秀，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科学的春天里，疾步如飞的黄大年和百废待兴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

一颗赤子心，时刻准备着

“对我而言，我从未和祖国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黄大年虽然身在海外，但一颗心，时刻准备着回来。

作为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在英国搞科研，始终是一个被追赶者，但他并不觉得荣耀，因为他是“有祖国的人”。

“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满腔赤子情，一颗报国心。对于黄大年来说，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才是最大的成功，才是今生今世最大的价值。

1992年，黄大年再次来到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启动，通过层层筛选，黄大年拿到了全国仅有的30个公派出国名额中的一个，他被派往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是同批留学生中唯一来自地学领域的博士生。

“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临别时，黄大年铿锵的话语，至今留在老师、同学的心中。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千人计划”专家毛伟健与黄大年结交已有25年。黄大年来到利兹大学攻读博士时，毛伟健正在利兹读博士后。“他背个双肩包，一见到我就兴冲冲地自我介绍。”第一次见面，黄大年就给毛伟健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知音初遇，惺惺相惜，后来经常在一起谈生活、谈学习。

黄大年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四年里，他对时间吝啬至极，每分每秒都在吸纳、都在追赶。1996年12月，黄大

年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该系获评优秀学生中唯一的海外学生。

博士毕业后，黄大年回到母校。此时，国外同行在航空地球物理方面的研究日新月异，黄大年唯恐落下追赶的脚步。第二年，经单位同意，他又前往英国，继续从事探测深水油气和水下隐伏目标的研究，成为当时该领域的少数中国人之一。

这是一家名为 ARKeX 的航空地球物理公司，黄大年在公司里担任高级研究员和研发部主任，是一个被仰望的传奇人物。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 300 人“高配”团队，主要从事海洋和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方法、技术和装备研发。它是一种能够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和条件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装备，被广泛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是强国展示实力的重要标志。

本领过硬，黄大年成为国际著名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专家，受到国际同行的尊敬。许多年后，当黄大年带队到他曾经工作过的英国公司考察时，对方安排他们参观正在研发装置的核心部分，甚至不吝介绍其中的重要参数。此情此景，让随团考察的中科院院士罗俊感慨万分：“我从事这项工作多年，还第一次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如此隆重的接待。

一晃 10 多年，英国俨然成了黄大年的第二故乡。事业有成，收入优渥，有花园洋房，妻子在伦敦经营着两间诊所，女儿也上了大学，一家人的生活安逸舒适。

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团熔岩渴望爆发、渴望奔涌，渴望将这份光与热奉献给祖国。

2004 年，黄大年正在大西洋深水处攻关“航空重力梯度仪”军转民技术时，父亲走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电话那头，父亲深情地对大年说：“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也悄然离去。当时，黄大年正在国外一个空军基地做试验。母亲临终前，留下的还是那句话：“你是有祖国的人。”

自古忠孝难两全，康河的水，大年的泪，赤子的心。

海漂 18 年，黄大年一直怀揣着对祖国的惦念，对父母双亲的惦念，无论是回国讲学还是参加学术会议，他总会像一叶风帆急急驶来。而 18 年后真正归来，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不愿做康河柔波里的一条水草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但总有相似的星光交相辉映。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过两次大的归国潮，都与国家、民族的召唤紧密相连。

李四光们的归来，是奔向“新中国”；黄大年们的回国，是践行中国梦。

2008年12月，中国决定实施“千人计划”，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或以适当的方式为国服务。中国梦这三个字，让以黄大年、施一公、潘建伟等为代表的留学人员无比振奋。他们纷纷汇入归国大潮，引领中国在多个科研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从“救国梦”到“强国梦”，从“个人梦”到中国梦，两代留学生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报国的赤诚。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漂泊18年，黄大年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机遇，等待一次召唤。

2009年4月，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的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远在英伦的黄大年。

听到母校的召唤，海外赤子的一颗心，被彻底激活。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明确表示，考虑回国。

黄大年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黄大年。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在黄大年给刘财的一封邮件中，爱国之情一览无遗。

剑桥的宁静，康河的柔波，在黄大年心中难免有牵绊、有不舍。他的科研团队也再三挽留。“伙计，你别走，留在这里，我们会有更多成果。”国际航空物理学家乔纳森·沃特森后来回忆说：“当黄教授离开英国返回中国的时候，我们特别

悲伤，对他的为人以及事业上的成就都非常尊重，许多人想让黄教授留下。”

他的妻子张艳在卖掉苦心经营的两个诊所后，蹲在一堆医疗器械里失声痛哭，她是学医的，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

可黄大年归心似箭，再难动摇。

“康河留下了我的眷恋，而地质宫刻有我的梦想。”那时，国内顶尖科研单位的许多橄榄枝，都向黄大年抛来，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校，因为那是他梦想出发的地方。

2009年12月24日，平安夜，长春大雪，一架民航班机缓缓降落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18年的英伦生活，黄大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6天后，黄大年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他因此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每每想起签约的场景，黄大年都会感慨万千，以至于7年后的同一天，他彻夜难眠，在朋友圈中这样写道：

“从海漂到海归一晃18年，得益于国家强大后盾，在各国才子强强碰撞的群雄逐鹿中从未言败，也几乎从未败过！有理由相信，回归到具备雄厚实力的母校，只要大家团结和坚持，一定能实现壮校情、强国梦。”

一人力量小，“千人”力量大

“我最骄傲的，就是入选了‘千人计划’专家，因为有一群赤胆忠心的‘千人’和我一样回归祖国，一同前行。”

世界科技的竞争，往往没有第二，只有第一。地球深部探测技术，也是如此。

地球深部还隐藏着多少秘密？这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需求。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 70 至 90 年代已经完成一轮深部探测，牢牢占据了地质科学领域的制高点，而我国在本世纪初才刚刚起步。国家战略的推进，需要一批科技领军人物，需要一批战略科学家。

黄大年，就是“千人计划”引进的一位不可多得战略科学家，他能深入专业探幽微，又能跳出专业览全貌，有着深邃的战略眼光、高超的科技宏观决策能力和凝聚其他科学家的巨大人格魅力。

他的回国，能让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 100 海里，就说明了一切。

2009 年 4 月 22 日，第四十个“世界地球日”到来的时候，我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正式启动，叩响了“地球之门”。

这是我国历史上实施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计划，是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重大战略计划。该计划设置九大项目 49 个课题，集中了国内 118 家机构、1600 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被称为中国地学界的“集结号”。

一声号角响，万千英才聚。

黄大年甫一回国，就被委以重任。作为第九分项“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首席科学家，他以吉林大学为

中心，组织全国优秀科研人员数百人，开启了深地探测关键装备攻关研究。

黄大年致力攻关的“航空重力梯度仪”，就像一个“透视眼”，给地球做CT，能洞穿地下每一个角落。这套系统十年磨一剑，在近年来探明的国外深海大型油田、盆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成功实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颠覆性”技术推动行业突破的典范。

但在这一产品和技术上，西方对中国实行最为严格的禁运和封锁。“这是国家发展无法回避与绕开的话题，要发展就必须要有装备，就必须突破发达国家的装备与技术封锁。”黄大年深知，要想叩开“地球之门”，必须靠中国人自己。

方向确定了，撸起袖子加油干！

可项目刚刚开展的时候，国外养成的惯性思维、行事风格、处事理念，让黄大年对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经常不理解，很生气，又无奈。

面对种种不适应，急性子的黄大年不仅要倒“时差”，还要倒“识差”。好在有“千人”同行，他觉得并不孤单，“大跨度的经历难免遭遇各种困难，拼搏中聊以自慰的追求其实也简单：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

一人力量小，“千人”力量大。黄大年搞交叉，搞融合，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做大增量。在黄大年的感召和努力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千人”纷纷来到吉林大

学，他们在不同学部、不同领域相互交叉、融合。如今，吉林大学的“千人计划”专家已经有 32 人。

大学科、多学科交叉，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必然趋势，黄大年深谙此道，他绘就了一幅宏大的吉林大学交叉学部蓝图：在深地、深海、深空、信息、新材料等领域交叉融合，以大学科支撑大科学，以大科学带动大学科。

2016 年 9 月，一个非行政化的科研“特区”初步形成：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式成立，黄大年任首任学部长。

成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是黄大年回国后最高兴的事。学校曾多次催他申报院士，他都风轻云淡地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每一个学生，黄大年都要精心雕琢。他说，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同时也是目光高远的教育家，他培养学生不仅是“授人以渔”，更是为了学科发展的未来、人才建设的未来、国家战略的未来。

“中国正努力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而这段并不平坦的进程需要几代人去完成。如何培养更优秀的人才，让文化与智慧长久地传承下去，值得每个人思考。”黄大年这段话，体现的正是他致力于培养国家高精尖人才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2009 年秋，黄大年为新生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周文月为能听到这样一场大科学家的报告感到幸运。更幸运的是，

这位大科学家后来还成为了她本科到博士期间的导师。黄大年的悉心指导让她感动不已，“光是课题‘汶川震区地球物理及地壳运动特征研究’就不知改了多少遍，每一个细节，黄老师都不放过。”

2010年，吉林大学启动“名师班主任计划”，黄大年担任第一届“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还自费为班里24名学生每人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他说信息时代就要用现代化的信息搜索手段，追求先进的理念必须从细节开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首席科学家当起了本科班主任，很多人不理解。而对于黄大年来说，这是理所当然。在国外，越是名师越要给本科生上课，如果学生在本科阶段接触到一流的教授，会受益终身。在这件事上，黄大年有亲身经历。他在读本科时，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院士的一次讲座，让他一下子打开了眼界，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走出去看一看”。

这是一种深远的师承。

“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这是黄大年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他激励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不能只做国内的佼佼者，应视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学生为对手。

在黄大年看来，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只要因材施教都能成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跟我搞研究将会很苦，但

一定很值得。”每带一届学生之前，黄大年都会和学生说同样的话。

黄大年的办公桌旁有两张椅子，两台电脑。倒不是因为“阔绰”，而是专门为学生准备的。学生来了，就坐在黄大年身旁，一人一台电脑，讨论清晰高效。

他办公室的窗户无论冬夏，都开一条缝。“思考需要氧气！”黄老师的连珠妙语经常把学生逗乐。

办公室对面，是一间小有名气的“茶思屋”，这是黄大年专为学生开辟的“造梦空间”。这里原本是杂物间，简单装修一下，几组沙发，两套茶具，一个吧台，就是一处休闲的所在。学习累了，心情差了，大脑一时“短路”了，都可以到这里来喝喝下午茶，许多“脑洞”也许就轻松打开了。

黄大年打造这间“茶思屋”，一定是受到剑桥大学到处都是咖啡屋、酒吧的启发。据说，科学家詹姆斯·沃森上世纪50年代就在其中一家酒吧里边喝啤酒边聊天，构思出DNA双螺旋结构，为此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学生们非常喜欢这间“茶思屋”，更明白老师开辟“茶思屋”的用意。

在学生心里，黄大年既是一位严师，又是一位慈父。怕学生节假日想家，他就邀请学生去自己家做客；谁感冒了，他抽屉里永远预备着感冒冲剂；听说一个学生父母腰有病痛，就托人从国外带回药片；要出远门，他带着学生的作业在路上批改；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仍不忘叮嘱学生修改作业中的错漏……黄大年最想做的，就是带出一批像样的年轻

人，在地球物理研究的国际舞台上，站得住脚，有话语权，让中国的脊梁挺起来！

“四海同仁扼腕叹，满园桃李呜咽鸣。”这样一位只想着别人的人，从来没时间考虑自己的健康。

黄大年走了，他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近 800 人前来送别。偌大的告别厅装不下太多的悼念，省领导来了，国家有关部委领导来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来了，同事们来了，学生们来了……

黄大年走了，他视若孩子的学生们泣下似山雨：“我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若有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学生……”

黄大年走了，他的同事泪崩如决堤：“黄老师，我又没有特意去想你，只是科研项目遇到难关时，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黄老师，我又没有特意去想你，不敢让自己经常想到你，因为太多事情还要去做，你的遗愿还要继续……”

一朵洁白的浪花，奔腾着抵达理想的彼岸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斯人已逝，当人们今天再次翻看黄大年在 1988 年写的这份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入党志愿书，无不为之动容。

这段文字，像一个预设的程序，在对初心的坚守中，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运行；

这段文字，更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虽历经风雨寒暑，最终扎根沃土，华盖参天，达成了一个完美的心愿。

黄大年是一代人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460万留学生的楷模，正如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所说，“他的精神感染、激励和鼓舞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团队、几届学生、一所学校，而将是一个领域、一批学子、一代人。”

2016年6月28日，北京青龙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通过了评审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表明，作为精确探测地球深处的高端技术装备，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用5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的路程。

中国进入“深地时代”！

地球物理界震惊了。国际航空物理学家盖里·巴尔内斯用两个“非常”评价黄大年：“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课题，他做出了非常多的创新。”

在场的评审专家无不对项目、对黄大年交口称赞。可谁也没有注意到，黄大年身上散发着一丝冰片的气味。

他吃了速效救心丸。

黄大年是在赴京前一天晕倒在办公室的。“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

回国7年，他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常常忘了睡觉、忘了吃饭。地质宫507室，是黄大年的办公室，只要不出差，屋内的灯光每天要亮到凌晨，门卫大爷早已习惯了他的工作节奏。

回国7年，他超过1/3的时间在出差，不肯浪费宝贵的白天，他总是订夜航，在飞机上入眠。

每次出差回到办公室，他就把会议吊牌随手挂在衣柜的横杆上，7年下来，竟攒了满满的一杆，大小各异、五颜六色的会议吊牌，每一个都是他奔波劳碌的见证。黄大年的秘书说，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在办公室的北墙上，贴着一张2016年的巨幅日程表，几乎每一日的格子里，都有安排，最后填写的是：2016年11月29日“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记录便戛然而止。

黄大年为什么如此惜时不惜命？施一公替他作出了回答，“在前沿科学研究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优秀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每当黄大年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就看一看办公桌对面的那张照片，那是2010年夏天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

北戴河与“千人计划”科学家代表的合影。看到这张照片，无穷的力量便又在心中回升。

东奔西波，黄大年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家，反而成了一个短暂的栖息地。他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妻子张艳。

从卖掉诊所、舍弃“医学梦”跟随丈夫回国，到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他、爱护他，张艳是黄大年一生中最坚强的后盾。他对妻子许下一个又一个诺言，“再有一年就忙完了。”“再有一年就是正常的生活节奏了。”可是，年复一年，黄大年还是那个有家难回的黄大年。

有时候，有些话，男人是说不出口的，唯以文字来表达。一到节日来临，他便在朋友圈里抒发几句感慨：

2016年2月22日，元宵节，他这样写道：“办公楼内灯稀人静，楼外正是喜气洋洋。我们被夹在地质宫第五层，夹在‘十二五’验收和‘十三五’立项的结合部，夹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割舍的中间。没人强迫，只是自找，总想干完拉倒，结果没完没了，公事家事总难两全。”

2016年9月10日，教师节，他写道：“可怜老妻一再孤独守家，周末、节日加平时，空守还是空守，秋去冬来，在挂念中麻木，在空守中老去。”

人毕竟不是机器，哪里经得起这样无休止、高强度的运行？2016年11月29日，也就是办公室日历上有记载的最后一个日子，黄大年再次晕倒，这一次是晕倒在飞机上。他醒

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检查结果在预料之中：住院治疗，但却比预料的更糟：胆管癌。

2016年12月14日，一向健壮的黄大年，被推上了手术台。

手术前一晚，当探望的人离开后，他独自在病房打开微信相册，从头翻到尾，过往的岁月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他知道自己即将踏入“战场”，于是在朋友圈里写道：“人生的战场无所不在，很难说哪个最重要。无论什么样的战斗都有一个共性——大战前夕最寂静，静得像平安夜……”没想到，这成了黄大年朋友圈的最后一条。

他去世前一天，“千人计划”联谊会换届。施一公在介绍完候选人黄大年的基本情况后，忍不住说了一句：“大年病危，正在和病魔殊死搏斗。”全场肃然，唏嘘一片，大家不约而同，高票推选黄大年作为副会长，每一票都是祈祷，每一票都是挽留！

此时，在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女儿黄潇正在分娩的疼痛中挣扎。一声啼哭，黄大年的外孙“春伦”降生，这是他早就为外孙起好的名字：长春的春，伦敦的伦。当家人把手机上婴儿的照片举到他眼前时，黄大年的意识正在渐渐远去。

黄潇与父亲上一次见面，是在去年她的婚礼上。父亲特意请假匆匆赶到英国。那一天，父亲既高兴又不舍，搂着穿婚纱的女儿，在优美的音乐中翩翩起舞。很久没有这样近距离看女儿了，原来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这么美了，要嫁人了，父亲含泪的微笑，没有逃过女儿的眼睛。那一天，父亲送给女儿一块老旧的手表，那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姥爷送给他俩的传家宝。父亲将手表给女儿戴上，便匆匆离别。

这一别，竟是永诀。

2017年1月8日13时38分，一颗强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英雄魂魄化作一只百灵飞向了天空。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

大年，这是你生前最喜爱的歌，每当唱到深情处，你都禁不住泪眼婆娑。

“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

大年，这也是你的同事学生好友亲朋最想唱给你的歌。你的青松气质、红梅品格，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你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情怀，如山一样的巍峨！

英雄无悔，在梦想出发的地方，你把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

国士无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你！

杨红军：一辈子扎根佤山村小

一入雨季，阿佤山区的空气中便多了几分潮湿的气息。7点，天还未大亮，南腊完小教师杨红军走出学校里那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陋宿舍，一手拿着斑驳脱漆的保温杯，一手提着装满书本的布袋子，匆匆向教室走去。

在杨红军35年的教师生涯中，类似的场景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位于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西北部的南腊村坐落在中缅边境上，乘车去县城要在山路上颠簸三四个小时。

生于斯，长于斯，杨红军的人生和他的教师生涯一样，与村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

“他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

南腊完小的前身是一所乡间私塾，创立于1931年，而后，几经变迁，数易其名，于2007年确定为如今的村级完小。虽然只是一所村小，却有近400名学生、30多名教师，还附设一个有100多名孩子的幼儿园。

杨红军的小学时光也是在这里度过的。事实上，除了初中毕业后去市里读师专等几段有限的时间，他几乎没离开过这所村小。

1984年，从云南省临沧师范学校毕业的杨红军分配回南腊乡（现更名为芒卡镇）任教，先是在其他两所“一师一校”的村小工作了7年，1991年调入南腊完小（当时名为南腊民族小学）。

同一年，杨红军因工作突出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谈起这项荣誉，他淡定得让人感到意外，回忆当时的情形连具体时间也只是依稀记得。人们都知道，对一名乡村教师来说，这不啻一次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良机。

那之后，的确有多所城里条件很好的学校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但都被他委婉拒绝了。“我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这块土地。”当被问起为何放弃调去城里学校这个很多身边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时，杨红军轻描淡写地答道。

除了脚下的土地，他深爱着的，更有这片土地上的学校。“放长假离开久了，惦记学校的情况，我就会打电话问杨老师。每次他都回答：学校很好，我一直在，放心吧。”南腊完小校长李快忠说，“每当听到他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到安心和感动。”

南腊完小的饮用水要用水管从山上的水源地接进来，夏季频发的山洪有时会导致学校断水，这时，需要有人沿着陡峭泥泞的山路步行5公里，去水源地进行维修，杨红军每次都主动要求前往。

李快忠手机里保存的一组照片，再现了这样的场景：2017年6月，洪水冲断了水管，刚下课的杨红军马上跟几位同事赶往山上。上山的路被洪水淹没，水源地更是一片泽国。杨红军光着膀子，满身都是污泥，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修理着输水管。

山上蚂蟥多，稍不注意就会被咬到。“那天，杨老师满身都是蚂蟥咬的伤口，流着血一路走回学校。”李快忠回忆道。

对此，杨红军毫不在意，看到学校供水恢复正常，他轻出了一口气：“哦，没有白辛苦。”

“他的敬业精神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从1991年调入南腊完小至今，除了担任学校领导职务的6年，杨红军多数时间承担着五、六年级班主任的工作，既教数学又教美术、劳技等课程。

2003年，杨红军卸下校长一职，重新回到自己此前的“老本行”——数学教研组长。与做行政工作相比，讲课、教研更让他感到踏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获得感”。

同事们都说，杨红军总是早出晚归，除了上课，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改进教学。

“陈旧的知识 and 理念需要不断更新，不然就会被淘汰于现在的课堂。”尽管教了30多年数学，对这项早已轻车熟路的工作，杨红军仍丝毫不敢松懈。

杨红军工作中的一件件小事，同事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杨老师住得离学生宿舍近，每天学生吃过午饭回宿舍午休后，他都主动去巡楼，遇到有学生调皮捣蛋影响其他人休息，还要维持一下秩序。一圈转下来，自己常常就没时间午休了”；“下午放学后，他除了批改作业、备课外，还经常给学生辅导功课，也会领学生读课文、练字，有时候忙着忙着就错过了吃晚饭”……

“他身上的敬业精神让我们非常佩服，我们也一直把他当成学习的榜样。”同是数学教师的杨忠玉说。

“他平时工作忙，家里的事里里外外基本都是我来做，像过去娃娃病了、需要督促学习这些事儿，他都没时间管。”杨红军的妻子周银芳说，尽管如此，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对丈夫表示了极大的理解，“要以他的工作为主，让他在学校好好上班。”

“他像辛勤的园丁呵护我们成长”

极少拍照的杨红军，家里连一张像样的生活照都找不到，每年和毕业生的合影几乎是他仅有的照片。

翻看这些多半已经泛黄的照片，杨红军眼神中泛着平时少有的光彩：“这个上学时特别能吃苦，现在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成绩很好，但是家里很困难，我有时候会找他谈心。”“这个女生爱打篮球。”……先后送走了 20 多届毕业生，他们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杨红军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杨红军爱学生，这份爱无声地渗透在日常的点滴之间。

学生中有不少是留守儿童，父母长年不在身边，小小年纪就要住在学校。对这些学生，教师除了课上传道授业外，课下还要照顾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知从何时起，杨红军当起了男生的兼职理发师，哪个男生头发长了，下课后他便在学生宿舍门口摆上椅子，挥起“电推子”三下五除二，乱蓬蓬的头发就变成了整齐的小平头。

学生生病了，他在医院整夜陪护、帮学生取药；平时他要走十几里山路去学生家里家访……学生们提起的种种小事，勾勒出一个学生的事件件上心、无微不至关心学生的教师形象。

“他像辛勤的园丁呵护我们成长。”王玲媛的话代表了众多学生的心声。

提起这些，杨红军淡泊的态度一如他面对名利所表现的那样：“我的根在这里，看到学生们期待的眼神，我就下决心要一辈子扎根在这里，一定要把他们教好，把他们送出大山。”

于漪：坚守三尺讲台，胸怀江河世界

一、在基础教育领域，她的名字无人不知，并非因为轰轰烈烈，更多源于踏踏实实

她写下400多万字的论文专著，上了近2000节的公开课，她的名字和语文和教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获得了来自政府和业界的所有荣誉，她赢得了同行和学生的一致尊敬，她的一生都在三尺讲台坚守，胸中却怀有江河世界，她是一名真正的老师，我们甚至可以说她是整个中国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

于漪的少年时代在艰难中度过。日本侵略中国，她亲眼看到邻居的房子被炸毁，人也因此殒命，哀哀无告。她往乡下逃难中不慎一脚跌倒，下巴磕出血，留下终身的疤痕。抗战胜利后，于漪在镇江中学读高中，宿舍是以前的养马场，简易的木板当床，点的是油灯。尽管条件艰苦，她的心中已埋下理想的种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于漪遇到过许多挫折，“一切为民族”的理想却不曾动摇。动乱年代，于漪被陌生初中学生打伤腿，两年才好。她亲眼看到学生拿皮带抽老师，还破坏门窗、烧地板。十年“文革”中，于漪却没有趴下，她心里想的是，一定要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彰显善良的人性，驱赶内心的兽性。

恢复高考之际，于漪针对不同学生知识基础差异显著的情况，打算把学生分为快班、中班、慢班，但去问领导，他们都不敢拍板。有人就劝于漪，还是不要跳出来了，以前你吃过的苦头还不够多吗？于漪自担风险，毅然决定这么做。在首批高考中，有两个班的学生全部考入大学，充分证明她的办法行之有效。

于漪担任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后，把身边所有老师团结起来，包括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人，评职称等都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于漪说，“学校的事业要浩浩荡荡，就要团结起一切力量。心中有了事业，个人的恩怨就不算什么了。”

十年动乱结束后，困在教师头上的修正主义帽子被摘掉，于漪扬眉吐气，感到教育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1977年，北京和上海分别在电视上直播中学老师讲课，于漪是上海的主讲人。导演问她讲什么，于漪回答，就讲高尔基的《海燕》吧，因为里面有一句话“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正是她的深切感受。

1978年，于漪被评为上海首批语文特级教师。年底她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会议，随后作为妇女代表团成员前往日本访问考察。回国时仍然到北京，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于漪说，“在北京的每一天，我都能听到干部平反的消息，感受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威力。从脱掉修正主义帽子到评为特级教师，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还在北京见证了春回大地。”

从课堂授课到教育改革，从呼吁“教文育人”到倡导“弘扬人文”，从培养学生到培养老师，于漪倾情投入到改革开放进程中，为教育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时至今日，快要满 90 周岁的于漪依然在忙碌着。“教育是滴灌生命之魂。老师教历史风云、天地人事，目的不是让孩子学会应对考试，而是唤醒他们的生命自觉，点亮生命之火。”于漪说。

二、坚守三尺讲台，胸怀江河世界

20 世纪 80 年代，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大上海万人空巷，全国人民纷纷守在电视机，争睹她上课时的风采。事后，连高教界都在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这位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这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这位老师教过的学生，十几年后再来看望她，还能把她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一字不差地背出来，有的还能记起当时她在黑板上的板书，学生说：“你怎么讲的，我们都记得。”

这位老师曾说出，“师爱超越亲子之爱”这样的话，她说，“学生的天就是你的天下，学生都是你的儿女。”

而她在以后教学工作的 60 余年里，用切身行动证明着这话无半点虚假。

这位老师愿意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岁月奉献给三尺讲台，她的人生教学，是在用生命唱歌，用上课的质量来影响

孩子生命的质量，她告诉世人如何“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

这位老师会为了一堂完美的语文课，用格物致知的探索，血肉交融的感应，砥砺前行，以致一位青年老师从 1976 年开始，听了 3000 节于老师的课，都没有发现她上课有过任何重复的内容，哪怕是一篇课文教第二遍、第三遍，都没有重样。

于漪是教育界的“明星”，她家三代六口全部是教育工作者，回首于漪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和艰难困苦作斗争，旁人说她有一种忍辱负重、举重若轻的本事，于漪自己解释道，那是因为她想自己少一点，想学生想他人多一点。

三、做老师，要走进学生心里

于漪一生尊重两位教育家，中国的陶行知和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要使孩子的心同我讲的话发生共鸣，我自身就需要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

曾经的一次教育经历，让于漪后悔终生，一位女孩子做操不认真，老师反复纠正都不理睬，情急之下她叫出了这位学生的外号，于漪告诫学生不要去这样喊她，但是这个时候自己却讲了。

事后她真诚地跟这位同学道歉，这份歉意来自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和 20 年前初为人师时那份承诺。

于漪这辈子，没有骂过任何一个学生，没有挖苦过任何一个学生，这件事情让她懂得了，做老师，必须有宽广的心怀，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学生，而这个包容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走到学生的心里头，与他平起平坐，体会他的情感、体会他的想法。

一次家访的时候，于漪看到一家五口人，住在只有 12 平方米的破房子里，难过得流下了眼泪，经历过贫穷，经历过侮辱，她对这些孩子有着特殊的悲悯。

在那个经济收入普遍都不高的年代，于漪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孩子们身上，生活用品，学习用品，甚至是学生们家里的困难都尽力承担，对自己的孩子却一再省俭。

于漪说，“我到有些家庭中去看，真的是流眼泪的，工人的家庭就是一间房间，除了睡觉的床，一张桌子以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时候有一个姓何的学生患上肺病，雷米封，一瓶 6 块钱，我的工资是 72 块，他家里没有办法给他治，没有劳保，那些孩子的家庭很穷，我每个月买给他吃，让他把肺病治好。”

“学生身上的事，都是我教师心上的事，什么叫教师，学生的天就是你的天下，学生都是你的儿女，所以我说，师爱超越亲子之爱。

于漪认为对待孩子应当丹心一片，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学生心中一清二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把真爱播洒到学生的心中，学生心中才有老师的位置。

四、提升专业素养，是一个教师最好的敬业

1978年，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中学语文课堂，犹如一块干裂的土地，于漪的一批教学实录、教学磁带横空出世。

根据自己多年的语文教学经验，于漪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中学语文备课手册》等多部著作，这些浸润着于漪二十多年，不停思索和探究的语文教学实录，对于语文教师们来说，恰如久旱甘霖。

截至上世纪80年代，教育界还没有一个人系统完整地研究过教师学，而于漪把这个课题揽在了心里，她完成了两本教师学著作，《现代教师发展丛书》《现代教师学概论》，教育部将它们作为全国教师教育的培训教材，《现代教师学概论》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著作。

1986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教师学研究会，于漪担任会长，问及为什么叫教师学研究会？

于漪的眼中满是坚定与骄傲：“我们是想让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我们要有中国教师自己的教师学！”

2002年，于漪退休了，虽然离开了一线讲台，但她仍然心系教育事业，她把自己的晚年时光又无偿地奉献给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教师。

如今 90 岁的于漪，仍在为培养青年教师奔忙着……

从事 60 多年教育工作的于漪，把语文教学看作是她一生的事业。

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民族的未来，已经融于她血肉的教育，早就是生命里再也割舍不下的部分。

回溯人生，于漪有诸多感慨，从受业于师到授业于人，她心存感激：“老师使我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逐步逐步多起来，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老师是了不起的事，他可以使很多学生从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到懂得做人的道理，从无知到有知，所以我这一辈子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

五、语录——做一辈子教师，用一辈子学做教师！

教育，这个让人心甘情愿付出、沉醉的词语，涤荡在教师们心中最明净的位置，教育永远在路上，永远在每一位老师前行的步履中，行走，并铭记。

于漪有很多话语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畔，给我们每一位老师以启发和感动！

高铭暄：见证法治中国 尽心尽力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台州骄傲：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台州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法制日报、法治周末等各大媒体曾多次报道过高铭暄的事迹。

2018年6月22日，在《我与刑法七十年》新书发布会现场，高铭暄一直在认真听现场与会者的发言，这些与会者有他的同辈，他的朋友和学生，他们都是为高铭暄七十年的刑法人生而来。

那些不曾随着岁月而消逝的记忆，经高铭暄口述后被集结成册，《我与刑法七十年》的15余万字，记录着他的学术人生。

这位“视刑法学为至爱”的刑法学泰斗，在向记者解惑他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理由时，平静又铿锵有力地说了句：“要把中国刑法学搞上去，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初心：做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

玉环市的古渔村鲜迭，又叫鲜叠村，海鲜丰盛、层叠不尽，天天看着家门前船来船往，是出生于此的高铭暄幼时最深刻的记忆。

高铭暄小时候，鲜迭老家就曾被日军的炮弹打去半片，租住那房子的人被打死了；瓯海公学读初中一年级时，日军入侵温州城，学校无奈遣散学生，他和十多个非温州城里的孩子在老师带领下，在山区步行了十来天才回家；高中时期，温州中学又被迫迁往雁荡山的灵岩寺上课……那天晚上，他和堂弟聊天到深夜：两个日本兵进村，整村的人逃的逃藏的藏；日本地图只如一只小蚕，中国地图（当时含蒙古共和国部分）像一张大桑叶，偌大的中国，就这样被蚕食，老百姓总受欺负！他和堂弟相互勉励，立志要做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

这一切，鼓励着高铭暄的求学意志，也激发了他对家国的感情。随着社会理解的深入，又在法官父亲的影响下，高中期间，高铭暄把自己的终生目标定位为法律，希望将来能为中国法制的健全出力。考大学填志愿时，他一气报了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法律专业，并全部被录取。1947年8月，考虑到父亲当时在杭州法院工作，以及交通便利等因素，高铭暄选择了有“东方剑桥”之誉的浙江大学。著名的法学家李浩培先生任法学院院长，亲任高铭暄的刑法总则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浙大法学院被撤，在李浩培的帮助下，高铭暄辗转到北京大学继续学法律。毕业之际，正好有苏联专家来北大招刑法学研究生，他由此与刑法学结下一生渊源。

昔年孜孜求学的青葱少年，到如今著作等身的皓首老者，高铭暄被誉为“刑法学泰斗”“新中国刑法学奠基人之一”。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中国刑法立法起草 38 稿的学者，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导；他著有专著 6 部，主编、参与著述 100 余部，论文 300 余篇。其中，1981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1993 年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史》，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最珍视：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

尽管如今的高铭暄是人们口中的刑法学泰斗、著名法学家，而他最珍视的还是那三尺讲台。

“我选择了教书育人，就矢志不渝。”高铭暄略带笑意地说。

自 1984 年 1 月成为我国刑法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以来到 2018 年，他已经培养了 67 位刑法学博士生。所有学习中国法律的人，都绕不开他的著作和思想……但这些成就，并未留住他深远的目光。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角度日益深广。1984 年，中国司法部首次派代表参加在开罗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刑法大会。成立于 1924 年的国际刑法学会是全球

最高端的刑法研究机构，此前与中国学界未曾正式接触。

1987年，高铭暄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死刑问题研讨会。同时，受中国法学会的委托，他与国际刑法学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就中国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事宜进行了初步洽谈。1988年4月，在多方支持下，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正式成立，高铭暄任副主席；同年6月，国际刑法学协会理事会正式接纳中国分会为其国家分会会员。

在国际刑法学界的影响下，中国的刑法学学界变得更加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得到更加科学而迅速的发展。近年来，在高铭暄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中国的死刑改革、取消劳教制度、提倡社区矫正等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

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高铭暄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保住他从1954年10月的十年间的早期刑法立法资料，“成为学界不能弥补的空白”。

“我年岁已大，但心不老，愿意继续工作。”在高铭暄心中有着一点志气，“只要我们的国家富强，有影响力，有吸引力，刑法学就会做大做强，不会矮人一截”，刑法学应该成为一门显学。

2015年，当高铭暄成为首位获得国际社会防卫学会授予的“切萨雷·贝卡利亚奖”的亚洲人时，他考虑再三，用自己并不熟练的英语作答谢辞，“这份荣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首先属于我的祖国，属于中国刑法学界”。

袁隆平：赤子之心 追梦稻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国家授予 42 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值得注意的是，8 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有唯一一位无党派人士，就是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研究的袁隆平。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由于人多地少、人口增长以及耕地消耗等原因，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曾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曾有外国经济学家发问：“谁来养活中国？”

对此，中国人、中国农业已给出出色答卷。这当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不断探索、突破“杂交水稻”这道题。得到过众多国内外奖项的肯定，甚至获得过小行星命名，2019 年，他的故事走进了学校教材。不管是英文致辞还是开学寄语，他的出现频频拿下网络热搜，大家说，这才是要追的“星”。

“跳农门”

中国人的饭碗要拿在自己手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袁隆平 19 岁，高中毕业，即将报考大学。他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

报考哪一所大学呢？这个问题成了全家争论的焦点。父亲袁兴烈希望袁隆平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日后学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袁隆平却有自己的见解。他想回重庆读农

学院。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他始终难以忘记小学一年级的那次郊游的经历。

袁隆平：“在武汉读小学一年级的時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带我们到附近一个企业家办的园艺场，正好那是六月上旬的时候，桃子红红的，挂在树上好漂亮啊！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哎呀，我说学农好啊！从那个时候第一次印象最深了，我就觉得学农好！”

说服父母，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农门”。

1953年8月，袁隆平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他坐着烧木炭的汽车，又换马车，一路颠簸，足足走了四天，才来到距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的安江农业学校当老师。

他课上得好，学生回忆，“他不讲究，黑板写满了，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袁隆平到安江农校报到这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53年初，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获得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但是，饥饿的魔咒还没有远离。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袁隆平至今对饥饿记忆犹新。

袁隆平：“像我们这样的年纪，过过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饭吃，日子是真难过啊，要饿死人的！特别是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粮食安全是特别重要。中国人

的饭碗要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我们现在就是为自己解决粮食问题，我们在奋斗。”

“追”良种

寻得“野败”杂交水稻终有新突破

1961年7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袁隆平行走在稻田里。这时，一株特殊的水稻引起了他的注意。

袁隆平：“突然发现有一株鹤立鸡群的稻，长得特别好，穗子很大，很整齐，籽粒很饱满，我很高兴喽。当时估计这个品种可以产一千斤。第二年我把它播下去，播了一千株很好地管理，天天到田里面去观察，望品种成龙。结果一抽穗，大失所望，高的高，矮的矮，早的早，迟的迟，没有一株有它的老子那么好。”

望着高矮不齐的稻株，袁隆平突然来了灵感：莫非自己找到的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如果真的如此，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利用杂种优势，培养杂交水稻。

他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终于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六株雄性不育株。

此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中等农校的教师，他的研究一开始并不被看好，因为国际权威科学家普遍认为，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

袁隆平：“很多人反对。当时流行的水稻是没有杂种优势的。压力很大。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面积不小呢，有四分田，长得特别好。最后收获、验收时，糟糕，稻谷产量减产，

大概减产了 3%左右，减产了几十斤。稻草增产了将近 70%。后来人家讲风凉话，‘可惜人不吃草啊，人要是吃草，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发展前途’。”

试验失败，他调整实验，坚持研究杂交稻，遭到质疑，更经历过失败，但袁隆平没有放弃。他像“追着太阳的候鸟”一样，不辞辛劳地在湖南、云南、海南、广东等地辗转研究。1970 年，他的学生在海南南红农场沼泽中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袁隆平将它命名为“野败”。杂交水稻研究从此打开了突破口。

稻田里的“守望者”

“我一直有两个梦想”

1971 年到 1972 年，全国十多个省（区、市）的科研人员齐聚海南，袁隆平慷慨地将“野败”分送给大家，形成了一场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全国攻关大会战。1973 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标志着我国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经过十年公关，袁隆平于 1973 年成功培育籼型杂交水稻。

袁隆平常和人说起他做过的两个梦。

袁隆平：“我有两个梦，一个梦就是高产、更高产，就是‘禾下乘凉梦’，这是真正做到的梦，在我们高产杂交稻穗下乘凉。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走出国门，让杂交

稻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现在还只有几百万公顷，要做到八千万公顷。”

不久前，袁隆平刚过完 90 岁虚岁生日。他不服老，83 岁那年，曾经有人称他“83 岁高龄”，他当场纠正，“是 83 岁青春”。他可能是中国知晓度最高的科学家之一，他有“三不”，不爱拘礼节，不喜欢古板，不愿意一本正经。对水稻产量，他有孩子对待心爱玩具般的执着追求。

袁隆平：“像贪财的人有百万想千万，千万想一亿。我这个就是贪产量。到了几百公斤贪八百公斤，八百公斤贪九百公斤，九百公斤想一千公斤。最后一千二百公斤（每亩），十八吨（每公顷）。不满足啊，因为这是个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您 80 岁的时候的生日祝愿是一千公斤，已经实现了，90 岁，您也许了愿？”

袁隆平：“我现在是‘90 后’了。愿望，一个是超高产，向一千二百公斤冲刺。第二个愿望，是覆盖全球梦，把我们最好的杂交稻推向全世界。”

下田的“90 后”

电脑里长不出水稻

90 岁高龄的袁隆平，尽管身体大不如前，却依然“管不住”他那双迈向稻田的腿，“收不住”他那颗向着水稻的心。

袁隆平：“我跟你讲啊，累肯定是累的。但是一到了我们超级稻的田里面，我就兴奋起来了，就不累了。不亲自下田不行的，不能隔靴搔痒啊！必须要到现场亲自看。我培养研

究生啊，因为是搞水稻的，我第一个要求你要下田，不下田，我就不培养。我说电脑很重要，但是电脑里面长不出水稻；书本知识也很重要，书本里面长不出水稻。你必须到田里面，才能种出水稻出来。”

在共和国即将迎来 70 岁生日之际，得知自己即将获得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袁隆平说自己更希望的是，为共和国的生日献上一份来自杂交水稻试验田的“厚礼”。

袁隆平：“这对我既是鼓舞也是鞭策。我希望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粮食始终是国计民生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我们现在正在攻关的是超高产水稻，我希望今年我们的示范田，就是百亩片，实现一千二百公斤，十八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大庆献礼。”

卫兴华：立学为民 治学报国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不做“风派理论家”——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

卫兴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 60 余年，在我国经济学界地位和学术影响力非同一般。

1925 年，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时，老师给他取名“卫显贵”，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从小目睹日军暴行的他，在读中学补习班时，把名字改为“卫兴华”，立志抗击日寇、振兴中华。

1946 年，卫兴华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7 年在解放区正式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出狱后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后，卫兴华先后在华北大学和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 年，卫兴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经济学系研究生，以全优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此后 60 多年里，他每次在给学生上的第一节课时，都一定会反复叮嘱：不能做风派理论家。卫兴华说：“走自己的路，由他人去评说。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我讲做学问‘四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学风，严密的论证。不要跟风跑，不要做风派理论家。”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卫兴华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理论观点：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较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较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卫兴华始终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要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上世纪 50 年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理论，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改革开放后，他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并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说，卫兴华老师的著述并非只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脉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60 余年来，卫兴华笔耕不辍，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等文章 1000 多篇，出版《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等著作 40 多部，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于2013年获得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卫兴华做学问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多年教学中，他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阐释，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实际，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

2015年底，卫兴华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他把100万元奖金无偿捐赠，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如今，94岁的卫兴华虽病痛缠身，但仍坚守在教学一线，担任博士生导师，每天坚持学习、工作。

60多年前的一本已经泛黄的《资本论》，卫兴华依然舍不得丢，放在书架上随手能找到的地方。里面几乎每一页都用红蓝黑三个颜色的笔标示出不同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一行行小字，记录下卫兴华初见《资本论》时无以言表的兴奋。他说：“看得章节多的可能看了三四十遍。特别是最核心的理论部分，反复看，现在还在看。”

这是卫兴华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做学问一辈子坚守的原则。为此他不是没吃过亏，文革十年被勒令靠边站，甚至讲课的内容都被严格划定范围。卫兴华从不怀疑自己的坚持有什么错，相反，于他而言，倒成了因祸得福。他说：“什么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就不能参与现实政策的宣传，不能参与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让我讲《资本论》。《资本论》离现实远一点，基本原理，所以对我也有好处。为什么后来我《资本论》读得多？我讲一次看一次，而且每一次看《资本论》的时候，都有新的收获。”

讲一次看一次，就在一遍遍翻看《资本论》的过程中，许多重要章节卫兴华都烂熟于心，不只是讲课更加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他总能在书里找寻到最恰当的观点支持。卫兴华说：“比如《资本论》在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里面讲，我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的面貌，我是把社会的发展看成自然的历史过程，更不要个人对经济历史负责。就是说它不要资本家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制度负责，我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们过去搞唯成分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最早系统研究和论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最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六十多载春秋，卫兴华发表了2000多篇学术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邱海平感叹，这个纪录，令人敬仰。邱海平说：“到现在为止发表的学术论文两千多篇，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卫老师每一年发表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经济学院这个数量还没有人能够打破，可以说创造了非常惊人的纪录。”

让业界更为敬佩的是，卫兴华总能在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及时澄清谬误、正本清源，用他毕生的心血推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化。

1987年，卫兴华对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效率公平并重，一度引发学界争议。反对者甚至认为，这是“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即使如此，卫兴华仍不为所动，他说：“我是学者，追求的是真理。”卫兴华表示：“我写书写文章，是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的，并重。现在我们都承认分配的不公平，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这样努力，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最本质的东西，这是马克思讲过的。”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何召鹏是卫兴华的学生。他告诉记者，跟随卫老读博士期间，卫老已接近90岁高龄，依然坚持每隔一到两周上一次专题讨论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坚持工作。他把我叫到床边探讨学问、写论文，让我拿着笔和纸，他来说，我来记。”

学生何召鹏懂得卫先生的这份坚持源自何处。在卫先生家书桌的玻璃板下，一直留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正青春的卫兴华和两个同伴的三人合影。彼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地下工作，曾被敌人抓进过监狱，后来因找不到证据被释放。卫兴华出狱后去了北平，两个同伴却在不久后再次被捕，惨遭杀害，这成为卫兴华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遗憾。何召

鹏告诉记者：“这张照片卫老师一直留到现在，他说当时参与地下革命的时候，好多朋友、同事都牺牲了，而他活了下来，只要他活着，他要用他全身的精力时间，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为祖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奉献他的力量。”

卫兴华上小学时老师曾给他取名“卫显贵”，希望他将来尽享荣华富贵。从小目睹日军暴行，卫兴华立志抗击日寇、振兴中华，在日军占领的东冶镇上高小附属中学补习班时，他把名字改为“卫兴华”。他说，一辈子始终坚持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论调进行辩论，就是为了当初追求的理想。“那时候我们搞地下工作、参加共产党干什么？没有工资、没有待遇，完全自我牺牲。就是一个追求，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共产党把国家建设好。那个时候不怕牺牲，不怕逮捕、不怕杀头，就是这样坚强的信念支撑着我们。”

60多年里，卫兴华著作等身，也目睹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界著名学者成长起来。魏杰、李连仲、黄桂田、张宇、马庆泉……“桃李满天下”，那是属于卫兴华的幸福。

年过九旬，一头银发的卫兴华依然笔耕不辍，儿子卫宏看着心疼，劝父亲别那么费神，可他听到的回答却是：将研究所得诉诸笔端，也是人生一大喜悦。卫宏说：“他在腰疼卧床的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在床上，不能起来，因为他疼。但是他在床上依然拿个硬板，垫上稿纸，在床上写文章，他说写东西，研究《资本论》，是一种愉快，一种喜悦。”

在卫兴华二儿子卫宏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上课就在自己的书房待着。“学生登门和他探讨问题时，他最随和。”

卫兴华卧室床头柜边，有张黑白照片，这是当年他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时与两位同事的合影，他一直保存到现在。

“当时参与地下革命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就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卫兴华说，“我还在燃烧！”

刘元春表示，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在卫兴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卫老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持之以恒、脚踏实地、日复一日的奋进精神，值得新一代学者传承。”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卫兴华这样寄语年轻学人。

获授“人民教育家”的国家荣誉称号，卫兴华感慨，他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将毕生所学贡献、服务于祖国建设，这是他不悔的追求，也是他幸福的源泉。卫兴华说：“我有一个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为解放中国而奋斗，怎么把我们国家变得富强，为广大老百姓的富裕、安康、和谐、共同富裕而奋斗。”

王蒙：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

一位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作家，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他以辉煌的创作实绩和多方面的工作，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少年到耄耋，从中学生党员到新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颗“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初心始终在王蒙的胸中跃动。

1948年，年仅14岁的王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参加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对我的意义非常大，那是完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世界。我亲眼看见旧中国和旧社会是怎样分崩离析的，到处是危机，百姓没法生活下去。”

王蒙激动地说，新中国像朝阳一样，有诸多的可能性和期待；在革命战争胜利凯歌声中建立起来，社会焕然一新。“新中国的成立、发展、建设是我一生的经历，也是创作的主题，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新中国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她的辉煌成绩我分享了，她的曲折和坎坷我也有经验。”王蒙的文学创作与新中国的行进步履紧紧相连。

从上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改革开放后的《蝴蝶》《布礼》《活动变人形》等，到进入新世纪后的《这边风景》及“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王蒙始终敏锐地捕捉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现实、反映现实。

他的作品清晰描绘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变迁，深刻剖析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 67 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王蒙创作了 1800 多万字文学作品，出版近百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作品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出版，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和多项国际性文学大奖，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高度。

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与时代、现实相呼应：

1953 年，王蒙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刻画了新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积极明朗、热情洋溢的精神风貌；

1956 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显示出他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以及在选材立意上的新意和勇气；

依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生活劳动的丰富经历，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生动表现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火热图景，并于 2015 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表姐》《布礼》《蝴蝶》《杂色》等，显示出王蒙对历史与人生的回顾和思考，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图景中十分具有代表性。

此外，王蒙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不断创新探索。

“王蒙既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思潮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面镜子。”有人这样评价。

谈及自己取得的文学成就，王蒙认为主要在于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

“我的兴趣广泛，热情持久，对各个阶段的各种情况都有浓厚的关注。我的少年、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立，这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曲折和挑战，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王蒙说。

在任职《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期间，王蒙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其人生经历、精神状态、探索活力和情操品行，也影响和感染了后辈作家。

“曾经有一篇被编辑否定掉的稿子，我看了觉得不错，就让它‘起死回生’，给发表出来了。”王蒙回忆说，这篇作品的发表影响了作者的一生，他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对于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手机浏览的现象，王蒙相信，人们终将会重新燃起对书本阅读的热情，这要求文学作品拥有经典、深刻、永恒的价值，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网络上有大量写得很好、引起读者兴趣的书，但是仍然显得追求数量，比较平面化。”

在王蒙看来，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光辉成绩和痛苦探索无与伦比。“这样的时代应该留下文学代表的杰作、经典，应该有更多深刻的作品出现，有成就更大的作家出现，有对这段历史的更多的咀嚼、消化、记忆和加工出现。我相信会有这样更好的作品和作家。”

王蒙希望，青年作家们能以最高标准摆脱畅销市场的诱惑，为国家、民族和历史创造新时代的经典。

如今，85岁高龄的王蒙依旧笔耕不辍，今年以来，发表了《生死恋》《邮事》《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等多部小说。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还承担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等研究工作。

“我希望能多写一点，一直写下去。”王蒙说。

从1953年写《青春万岁》时算起，我文学写作已经65年，2019年1月，我的中篇小说《生死恋》与小小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两则）》都将发表。那就进入第66个写龄了。

不知道是什么命运，《青春万岁》是写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以后才全文出版的。而《这边风景》，是1973年开始写作，过了40年2013年才全文出版的。能耐受数十年的销磨，然后至今仍然出现在书店里、出现在青年的阅读中，这倒是少见的安慰。

回想我出生三年后，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北京，我的整个小学阶段是在占领军的刺刀阴影下度过的。1945年二战

结束，我的爱国主义激情燃烧。从 1946 年我十一岁多就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1948 年，我破例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我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担任过高高低低的各种领导职务，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我坚信自己是彻骨的与坚持一贯的文学写作者，甚至担任文化部长的时候，也没有停过笔。

与一些从事写作的朋友不同，我学生阶段同时极度喜爱数学和文学，喜欢逻辑推理论辩，喜欢语言文字抒情。而少年时代我立志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到了 1952 年，我被“五年计划”所吸引，甚至想去报考土木建筑专业，这些都没有实现。革命的凯歌行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废俱兴，在一代青少年心灵中激起的波澜，我久久不能忘怀。我还感觉到，这样的青春激情、革命激情、历史激情，未必能长久保持下去，只有文学能延伸我们的体验，能记下生活、记下心绪，能对抗衰老与遗忘，能焕发诗意与美感，能留下痕迹与笑容，能实现幻想与期待，能见证生命与沧桑。能提升与扩容本来是极其渺小的自我。

“所有的故事都是好故事”，很奇怪，这句话不是小说家而是前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讲出来的。文学使一切都不会糟践：爱情是美丽的，失恋也可能更动人；一帆风顺是令人羡慕的好运，饱经坎坷的话，则意味着更多更深的内心悸动。获得是舒适的，而失落的话是更好的故事胚芽。甚至穷极无

聊的最最乏味的煎熬经验也能成为非同寻常的题材，如果你是真正的文学人。

开始，写作如同编织。如我的诗：“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后来，生活遭遇如同传奇故事，荒唐的经历，其喜剧性超过了悲剧性。我始终鼓励着自己，如我的诗：“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还有我在新疆的十六年经验，我手抄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乌兹别克语译文：“我们是世界的希望与果实，我们是智慧的眼睛的黑眸子，若是将宇宙看作一枚指环，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宝石。”

我已经满八十四岁了，中国的说法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我近年也写过不少谈“孔孟老庄”的经典的书，同时我一直兴高采烈地写着新的小说。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

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文学是我给朋友留下的遗言。文学是人生的趣味和作料，辣与咸，酸与甜，稀与稠，鲜活与陈酿。文学，是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的存在。

我也喜欢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对“你为什么写作”的回答：“因为别的事没有做成。”虽然有些小朋友对我的引用表达了遗憾。他们终究会明白，毕竟我丝毫无意贬低文学。

段江华：光华绽于朴实

被誉为“最美画家”“最美教师”的湖南师范大学教师段江华又将获得新的称号——时代楷模。为表彰他勇救落水儿童的义举，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段江华“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他成为我省首位以个人名义获此殊荣的人。

勇救幼童淡泊名利

在河西大学城与湘江之间，有一片明镜般的水域，长沙人称之为“后湖”，后湖国际艺术区就坐落于此。这里高手云集，是长沙重点打造的文化艺术高地。作为油画专家，段江华在这里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而他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工作室附近。

“赶快救人呐!”“救人，救人，叔叔救人!”今年3月4日下午3点多，段江华开车载着妻子吴涛、学生肖彬等正急着赶往橘子洲接远道而来的亲人吃晚饭。谁知，车子刚出了艺术区的门就听见了呼救声。赶紧停车，只见一个粉色的书包飘在湖面，孩子已沉下了水。52岁的老段来不及多虑就跳下了水，当时气温只有4℃，湖水齐肩，冰冷刺骨，他快速游向6米开外的小女孩，一把拽住小女孩身上书包的带子，把她的头从水下托上来，然后竭尽全力向岸边游。

孩子虽然被抱上岸了，但脸色发乌，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肖彬和吴涛迅速接力，先把孩子倒立呛出水，然后一人按压胸部进行心肺复苏，另一人做人工呼吸。“大概两三分钟

左右，小女孩嘴唇动了一下，脸上擦伤的地方开始渗血，脸也泛红了。”这时段江华才意识到自己浑身湿透，冻得直哆嗦。

不一会 120 急救车来了，高度紧张的段江华才松了一口气。长沙市四医院儿科医生杨波表示，溺水停止呼吸 4~6 分钟后就会出现脑死亡。如果不是获救及时且得到及时的心肺复苏，孩子很可能就没命了。

冒着生命危险跳入冰冷的湖水中救人，回想起那一刻，段江华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起孩子。”

事件发生后，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作出批示称赞他：“展示了高尚的精神风貌，彰显了社会的正能量，堪称我们身边的‘活雷锋’。”“最美画家”“最美老师”“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全国师德标兵”等称号和荣誉也接踵而来，可老段依旧谦卑如昨。段江华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说：“相信无论是谁，这种情况下都会勇敢去救人，我们只是做了很多人都会做的事。”

爱惜人才乐善好施

在麻阳县大山里长大的段江华深知知识对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他最爱惜人才。

段江华的学生，如今已是湖北美术学院油画教师的于轶文提起当年的老师，说得最多的是“感激”二字。

2000 年，具有绘画特长的于轶文从武冈老家来到长沙学习专业，家里只给他凑了 1600 元。于轶文说，来到长沙才发现画画的学费很贵再加上还要生活，1600 元最多能支撑一

个月。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于轶文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段江华画室的门，没想到段老师首先给他谈的不是学费而是让他先作一幅画。于轶文把认真作好的画交到段江华手中，没想到段老师连声称赞说“不错，不错”。可当他说出自己的窘迫时，段老师却轻描淡写地说“先找地方住下，来这里画吧，学费以后再说”。而这一画就是两年多，其间段江华再没提过学费，后来，段江华还将画室一楼的收藏室腾出来供于轶文居住。

学生石富是一名失去双亲的孤儿，求学期间经济拮据，难以为继，段江华爱惜他的才华，在学业上进行悉心指导，在经济上给予无私的援助。深受感动的石富奋发图强、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段江华说：“学艺术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奢侈的，每次发现一名可造之材，但是又家庭贫困，交不起昂贵的学习费用，我就觉得不能浪费了学生的才华，不能让他看不到未来。”

不仅资助自己的学生，乐善好施的段江华还经常向社会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今年4月，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小学六年级学生陈思怡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几十万元的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在得知有一个救助小思怡的艺术作品义卖活动后，段江华第一时间响应，捐出一幅油画《生命如花》。这幅作品被爱心人士以5万元的价格收藏，所得善款成了小思怡的救命钱。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湖南省油画学会成立之初，活动经费紧张，段江华带头捐出 1000 美元用于学会开展活动；汶川地震后，他带头捐画义卖，将画作拍卖所得 20 余万元善款全部捐给灾区；他还向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百年职校”捐赠画作……

为人亲和育人有方

全国知名油画家、湖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段江华拥有多种头衔。他的作品也经常荣获各类大奖：《国殇·文夕大火》获湖南重大历史题材金奖，《王·后二号》获第二届中国油画展金奖，《重现的辉煌》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优秀奖(2003)……可以说，就算没去救人，段江华的头上也环绕着不少光环。

面对诸多光环，段江华说：“我首先是一名老师。”他不太在乎外在的东西，他的同事王维评价称，段江华为人低调、亲和力强，以至于同事们都亲切地喊他老段，就连他的学生也经常这样喊。

说起老段，学生们谈得最多的也不是他获得的荣誉，而是他的教学。

学生张钊浩提交给老师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幅“薄画”，而段老师的风格却是擅长作“厚画”。在“厚画”面前，“薄画”无疑显得单薄，因为“厚画”的立体感和冲击力更强，原本想着和老师的风格不同，老师会不感冒。哪知段江华不仅鼓励他

继续坚持自己的风格，还推荐他多看看擅长“薄画”的中东艺术家阿里卡的作品。

风景写生课是美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风景写生也就是带着学生到外面转转，采采风、写写生，可段江华的上法却与别人稍有不同。上风景写生课时，老段带着学生去了北京。作为有着 3000 多年建城史和 850 余年建都史的古都，北京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刻画和描绘，可老段并没有急着带他们去写生，也没有硬性要求每位学生回去之前要完成几件作品。这些都是锻炼“手”的技巧，他更关注的是学生的“眼”。

拜访国内顶尖级艺术家，参观他们的作品，观看他们的创作；了解正在奋斗的青年艺术家的生活状态与创作；参观几场艺术展览……“从艺术名家那里我看到了原来还可以用石头作画，从青年艺术家那里我看到了他们不因贫贱而放弃艺术的精神。”张钊浩说，艺术是一门眼高手低的学问，硬性要求带回去几件作品可能会提高作画的技巧，而多看、多了解却打开了我们的眼界。

得知段江华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各路媒体人拿着“长枪短炮”再次蜂拥而至，他虽然没有拒绝采访，但每次也不忘重复说：“孩子获救，没留遗憾，是我最高兴的事。这件事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去互相帮助，也是一件好事。不过作为个人，我还是喜欢过平静的生活。”